

「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 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

張淑雅**

摘 要

八二三砲戰後不久，美國駐台北政治參事歐斯本(David L. Osborn)向國務院指出：國民黨因為最近改變了「反攻大陸」的立場，故在宣傳上調整政黨的理論基礎；並指出國府與國民黨內外「對此調整的接受度，可能在以下幾年對本地的政局會有決定性的影響。」國府當時是否真的改變了「反攻大陸」的立場或政策？還是只改變了「說法」？本文探討了砲戰對「反攻大陸」宣傳的影響，指出：砲戰確實在反攻宣傳中注入了幾個新的元素。首先，砲戰前以軍事反攻為主、引發大陸抗暴為輔的宣傳，逐漸轉變成以「公社暴政」激發大陸抗暴為主，軍事反攻為輔；亦即「軍事第一」的「武力反攻」，轉變成「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的「政治反攻」。其次，反攻在宣傳中從立即的目標變成長期的任務。最後，反攻宣傳結合了〈中美聯合公報〉內的文化元素，以及「人民公社」內反民族傳統的宣傳，為「自由中國」注入了保護民族傳統與文化的元素，讓「自由中國」逐漸變成「文化中國」。本文指出反攻宣傳的轉彎是逐漸的，每個轉變都經過黨政仔細評估決定。反攻大陸雖看來未執行，但卻是蔣介石與國府認定的「存在的理由」，故砲戰雖改變了反攻大陸的「說法」，卻未改變國府這個基本國策與執行的決心。

關鍵詞：八二三砲戰、反攻大陸、不使用武力、反攻宣傳、三民主義

* 感謝余敏玲、雷祥麟、曾麗娟、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集刊編委會與編輯人員提供的修改意見。
收稿日期：2010年4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8月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前 言

1958年8月23日黃昏，中共開始砲擊金門，兩個小時內打了將近六萬發的砲彈。此後砲擊時密時疏，至10月6日中共宣布停火一週，期滿再延長一週，至10月25日中共宣布此後將只在單日砲擊運補灘頭與機場，危機大抵落幕。西方史家稱此為「第二次台海危機」(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台灣方面稱為「八二三砲戰」，大陸方面則稱為「炮擊金門」。雖然砲戰未如當時國際輿論所擔心的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也未能如最初預期的拿下金門，中華民國政府（即當時國民黨領導的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更無法如砲戰前預設的趁中共攻擊的機會「反攻大陸」，但砲戰對兩岸關係與台灣的發展還是發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本文擬討論其中的一個面向——即對國府「反攻大陸」政策在「宣傳」概念上的影響。¹

砲戰一開始，國府就面對了中共以密集「鋼彈」封鎖金門，美國卻不許其攻擊大陸基地的軍事挑戰，沒料到的是：從全球各地落下來的「紙彈」²數量更多、攻擊性更強，也更難因應。「紙彈」攻擊的重點是：國府不該死守兩個沒價值的小島，將全球拖到大戰邊緣，而其「反攻大陸」政策就是問題的根源。國際輿論認為國府應該放棄外島、放棄反攻，接受中國分裂的現實。³從國府立場來看，這樣的要求不但挑戰了其基本國策，等於要求其否定自己「存在的

¹ 受限於文章的篇幅，本文並未深入探討或描述宣傳概念針對不同對象實際執行的內容、工具或方法；砲戰對實際「反攻大陸」政策與執行層面的影響，也不在此文中討論。

² 此處「紙彈」是泛指輿論所造成的挑戰，除報紙、雜誌等紙上媒體外，當然還包括廣播、電視等媒體的評述所造成的輿論壓力，不過當時最普遍的是平面媒體，故以「紙彈」稱之。

³ 「紙彈」的例子可見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的新聞秘書賀葛迪(James C. Hagerty)摘要9月9日到26日美國全國媒體批判美國外島政策社論(報告長28頁)：“Excerpt from U.S. Editorial Opinion Questioning, or Critical of, U.S. Policy on Quemoy-Matsu (September 9 to 26),” 1958.09.26, f: Quemoy-Matsu 1958, Hagerty Papers, box 9, Eisenhower Library。國府決策階層感受到輿論壓力的訊息來源，除了國外各種媒體直接的報導外，還有從各地使領館送回的當地輿論摘要，以及美國透過其大使轉達的壓力。例見第866號電，葉公超致外交部，1958年9月24日，405.21北美司，美匪華沙會談(五)，外交部檔案。

理由」(*raison d'être*)，⁴也將動搖全體軍民的信心。此外，台灣內部呼籲政府應對大陸施行報復性攻擊，或者趁機反攻；國府還得維持處於強烈砲火攻擊下，補給幾乎斷絕的外島部隊士氣。這些都是在砲戰期間國府所面臨的重大宣傳挑戰。

1958年11月18日，台海戰火剛剛舒緩不久後，駐台北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參事歐斯本(David L. Osborn)向國務院寫了一篇報告，指出國民黨因為最近改變了「反攻大陸」的立場，故在宣傳上調整了政黨的理論基礎；而國府內外「對此調整的接受度，可能在以下幾年對本地的政局會有決定性的影響」。⁵讀者不免好奇：這樣的觀察是否真確——亦即：國府當時是否真的改變了「反攻大陸」的立場或政策？還是只改變了「說法」？若是後者，國府當時是如何告知或誘導人民的？對後來的情勢是否真的有「決定性的影響」？

國府遷台後，看起來完全缺乏執行「反攻大陸」的軍事能力、也沒有真正發動軍事反攻，讓很多人（包括當時的政治家、觀察家與甚至後來的歷史學家）認為這個「國策」只是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獨裁統治與安撫大陸來台軍民心理的「藉口」，不是真正的「政策」。⁶但1950-1970年代生活在台灣的人，卻無時不處於「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口號與概念之中。國府「反攻大陸」國策

⁴ 美國認為國府遷台後所堅持的「反攻大陸」是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蔣介石自己說放棄反攻等於背叛被外國奴役的中國人，則國府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見 NIE 43-2-57, "The Prospect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7.08.27,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Washington: Dept. of State, 1990), v.3, p. 588；本月大事表，〈蔣介石日記〉，1959年1月1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USA；以下簡稱胡佛檔案館)。

⁵ Dispatch 225 from Taipei, 1958.11.18, re: KMT Doctrinal Adjustment to Modification of GRC Position on "Counterattack," 793.00/11-1858,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 United States (以下簡寫為 NA)。

⁶ 當時台灣內部最有名的批評是殷海光為《自由中國》雜誌所寫的〈反攻大陸問題〉，見《自由中國》，卷17期3(1957年8月1日)。認為國府沒有實際想要反攻的歷史研究，可例見 Steve Tsang (曾銳生)，"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i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48-72. 另見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10.

的虛實與演變非本文的重點，本文將觀察砲戰之前、砲戰時期與砲戰之後，國府如何向國內外宣達「反攻大陸」這個國策，以檢視砲戰對其所宣達的反攻概念是否有影響。

「冷戰與宣傳」是近來國外冷戰史學界相當關注的議題。⁷冷戰高峰過後，很多人開始認為冷戰其實是「意識形態之戰」，既是「語文仗」(war of words)，也是「爭取人心之戰」(battle for the hearts and minds)。⁸在這樣的「鬥爭」形態下，宣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武器。西方學者從冷戰開始後，就開始注意到宣傳策略與執行的問題，近十年來宣傳與「文化冷戰」更成冷戰史書寫的主流，代表了國際冷戰研究的重要轉向。⁹而美國總統的演說聲明、美國新聞處活動與「美國之音」宣傳，更是近來學者們注意的焦點。¹⁰不過國外歷史學界有關文

⁷ 宣傳是跨學門議題，主要是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與心理學者的研究焦點，國外冷戰史學者近來很關注此議題，但在國內主要還是傳播（新聞）學者的領域。例如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2）；林麗雲，《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

⁸ Louis J. Halle, *The Cold War as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7), p. 3, 轉引自 Shawn J. Parry-Giles, *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5*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p. xvii. 另見 Martin J. Medhurst, ed., *Eisenhower's War of Words: Rhetoric and Leadership*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awn J. Parry-Giles, "Propaganda, Effect, and the Cold War: Gauging the Status of America's 'War of 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1994), pp. 203-213.

⁹ 例如 James Schwoch, *Global TV: New Media and the Cold War, 1946-6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2009);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c2008);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c2006); Tony Shaw, *British Cinema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 Propaganda and Consensus* (London: Tauris, 2006); Giles Scott-Smith and Hans Krabbendam, e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0* (London, Portland: F. Cass, 2003); Gary D. Rawnsley, ed.,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¹⁰ 例見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an L. Heil, *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3); Shawn J. Parry-Giles, *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5*; Leo Bogart, *Cool Words, Cold War: A New Look at USIA's Premises for Propagand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Gary D. Rawnsley, *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 BBC and VO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6-6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化冷戰或冷戰宣傳策略的研究熱潮與焦點，似乎尚未涵蓋亞洲或中國地區。¹¹

隨同國府遷台的人士普遍認為：宣傳失利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蔣介石本人也覺得宣傳不力「任人污蔑欺詐」，讓美國大使館藉以歪曲事實，導致美國不支持他；¹²且宣傳「是共匪的特殊優點之一」，即中共的「宣傳得法（有效）」，是造成大陸失敗很大的原因。¹³因此，國府遷台後特別重視國內外的宣傳工作。只不過既然連國府本身都承認其在大陸的宣傳失敗，在台灣的宣傳則只是反攻、革命的老調不斷重彈，一向被視為「反共八股」，鮮少引起學界的注意。近十年來，台灣學者開始批判國府治台的歷史，連帶探討「反攻大陸」或「反共」意識形態對台灣文學、藝術、社會各層面的影響，也就逐漸注意到國府的「宣傳」政策。¹⁴這些研究對了解國府的宣傳組織架構、反攻論

¹¹ 少數研究例見 S. R. Joey Long,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55-1961," *Diplomatic History* 32:5 (November 2008), pp. 899-930;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 (February 2003), pp. 71-99; Richard J. Aldrich and Gary D. Rawnsley et al.,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London, Portland: Frank Cass, 2000).

¹²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2002），卷9，頁80。

¹³ 「蔣中正手書本年工作成敗得失各點共匪長處前途難關等大綱」，民國40年，籌筆，〈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另見蔣中正，《反共抗俄基本論》，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以下簡稱《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卷8，專著，頁20-21；蔣中正，〈如何改進我們革命的方法〉，《總集》，卷23，演講，頁280-282。有關此共識的討論，可見胡芳琪，〈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反共文藝論述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58-59。

¹⁴ 國外的研究如 Gary D. Rawnsley, *Taiwan's Informal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及 Gary D. Rawnsley, and Ming-Yeh T. Rawnsley, *Critical Security, Democratisation and Television in Taiwa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 2000) 兩書，焦點在近年來的宣傳政策，冷戰時期比較不是研究的重點。而 Jeremy E. Taylor, "Taipei's 'Britisher': W. G. Goddard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ist China in the Cold War Commonwealth,"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9:2 (December 2007), pp. 126-146，則是國府宣傳計畫一個有趣的個案研究。台灣學者注意到國府宣傳政策者，除了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32（2009年11月）一文外，多半為研究生論文。如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討論有關「反攻大陸」的宣傳架構與內容；林麗雲(Lin Lihyun)的博士論文“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ss-State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1945-1995,” (D.Ph.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1997) 討論國府接收台灣半世紀與報刊的關係。其他博碩士論文在此不詳列。

述的內容與傳遞方式等，都有一定的貢獻，不過討論的焦點都不包括八二三砲戰前後的宣傳策略。¹⁵

筆者在研究八二三砲戰的相關問題時，發現宣傳對危機過程的影響，絕不亞於軍事行動，甚至可以說當時全球媒體打了一場道道地地的「語文仗」，中共與國府更是有意識地展開強烈的「政治作戰」。爲了完整呈現砲戰的歷史，筆者乃想對國府的相關宣傳先做初步的探討，本文爲此研究方向的一部份，主要是透過砲戰前、砲戰進展的各階段，以及砲戰後所碰到的宣傳難題與因應的宣傳內容，理解國府砲戰中的宣傳究竟對其本身的定位——而其根本就是在「反攻大陸」政策——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國府究竟是否有歐斯本所說的明顯轉變其「革命論述」？以下先討論砲戰之前，國府對於反攻大陸的宣傳重點。

一、砲戰前的反攻大陸宣傳

1958年一開年，蔣介石就在元旦文告中指出：未來這一年對「國民革命」是「新的階段」，他要爲大家指出「因應這一空前變局」的道路。¹⁶雖然類似的話在元旦文告司空見慣，讀者可能不見得特別注意，但證諸這一年的發展，尤其是針對八二三砲戰對「反攻大陸」國策的挑戰與國府的宣傳回應而言，這些話卻頗有點預言成真的味道。

（一）「一切為反攻！一切為勝利！」¹⁷

其實從 1950 年代中期過後，國府就已經爲年年預告「即將」反攻大陸卻

¹⁵ 少數例外如林果顯，〈兩次臺海危機的戰爭宣傳佈置(1954-1958)〉，收入呂紹理編，《冷戰與臺海危機》（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10），頁 349-388。Gary D. Rawnsley 之文章，“Taiwan’s Propaganda Cold War: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es of 1954 and 1958”，則重點在批評國府冷戰宣傳策略的缺點，未直接討論危機時期的宣傳內容。此文收在 Richard J. Aldrich and Gary D. Rawnsley et al.,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一書中。

¹⁶ 《聯合報》，1958年1月1日，第1版。

¹⁷ 《宣傳週報》，卷12期8（1958年8月22日），頁6。

久久無法行動而感受到相當大的焦慮。¹⁸砲戰爆發之前不久的連串事件，包括中共呼籲國府與其直接談判、《自由中國》雜誌從 1957 年 8 月開始刊出的「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及所引發對國府的批評，加上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對國府威信的傷害等，都讓國府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其中，「今日的問題」第一篇，也就是被指稱是「反攻無望論」的社論，等於正面挑戰國府的基本國策（即國府存在的根本理由）與施政方針，造成的衝擊最大。¹⁹而與中共談判的可能性，以及彈劾案所反映出的國民黨內部問題，也一樣引發國府是否有誠意或能力反攻的質疑。這對認為要光復大陸，才能完成國民革命「使命」的蔣介石來說，更是沉重的負擔。²⁰

為了補救這幾個重大問題對反攻國策，以及國府作為「中國政府」地位所造成的威脅，蔣介石遂於 1958 年 2 月初開始，下令「加強黨組織、改進領導方法、恢復革命精神」。而反攻問題與彈劾案等問題的連續辯論，讓《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轉載了台灣報紙對國府領導能力與政策的攻擊，對國府國際形象的傷害可說相當大。故蔣特別要求要加強宣傳工作，除親自指示要修正出版法，管理「一切反黨、反政府、反民眾利益、反國家需要的言論和出版物」，並指示國內「最重要（宣傳）對象乃為對本省民眾與對本黨黨員以及對各方面的反動份子」。²¹國府打算藉美國對滲透活動的警惕為例（美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的報告），指出陰險的敵人「藉民主、自由為掩護，躲在後面對本黨和政府施以全面的攻擊」，而反共抗俄成功最重要的是「以台灣為基地的軍民同胞一致的努

¹⁸ 國府的焦慮可見張淑雅，〈台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6（2001 年 12 月），頁 259-261 的討論。而民眾也因「苦撐待變的心情日久乃引起了究竟何時反攻的焦慮，甚至發生了『究竟能不能反攻大陸』的疑問」，例見〈我們對於反攻大陸問題的把握〉，《聯合報》社論，1957 年 8 月 8 日，第 1 版。

¹⁹ 這是蔣介石在 1958 年 2 月初內部開會時提出的重大問題，見蔣中正，《本黨又是面臨時代一次考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8），1958 年 2 月 4 日。

²⁰ 蔣介石在日記內的記事顯示他對這些問題的重視，尤其是俞鴻鈞彈劾案所顯示的國民黨內部分裂，更是耗費他大部份的精神。見 1958 年 1 至 7 月的〈蔣介石日記〉，胡佛檔案館。

²¹ 蔣中正，《本黨又是面臨時代一次考驗》，頁 37-42；“Taiwan Editorial Criticized Regime,” *The New York Times*, 1958.01.14, p. 8。

力」，以此要求黨員協調辯正所有反黨言論，²²無論對內、對外，更要強調「我國反攻大陸之意義」。²³因此，砲戰爆發前半年，國府即已開始加強反攻大陸的相關宣傳。

之前，國民黨在 1957 年 10 月下旬舉行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已經決定，軍事反攻必須結合大陸的反共革命，主要是因為 1956 年以來東柏林、波蘭與匈牙利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共運動，以及大陸內部不斷發生的各種抗暴活動，²⁴加上整個冷戰局勢的發展，故從 1950 年代初期以來「軍事第一」的反攻策略與宣傳已經逐漸改變。²⁵蔣介石在 1957 年的國慶文告中，提出恢復人民擇業、溫飽、研究、經濟、安全與生活方式的自由，以及起義的官兵與國軍一視同仁、參加反共的各團體組織一律享有平等合法權利、參加匪偽政黨組織者除元兇外既往不咎等保證。²⁶此後，國府即不斷宣傳此被稱為「六大自由、三項保證」的號召，以誘發大陸人民的反共革命與共軍倒戈（以下將此概念簡稱為「抗暴」）、配合國府軍事行動，並以「反攻引發抗暴」的概念，作為「反攻大陸」必勝的宣傳主軸。

（二）「支援大陸反共運動！」²⁷

圍繞 1958 年反攻宣傳的範例之一，是中共六十三高射砲中校副師長張春生「起義來歸」。雖然以「反共義士」作宣傳的例子並不少見，但多半是集體宣傳，張春生卻被當作是響應蔣「三大保證號召」起義的解放軍高級幹部典範，

²² 《宣傳週報》，卷 11 期 7（1958 年 2 月 14 日），頁 1。

²³ 《宣傳週報》，卷 11 期 12（1958 年 3 月 21 日），頁 2。

²⁴ 《聯合報》，1957 年 10 月 24 日，第 1 版。1956 年到 1957 年的上半年，《中央日報》有關「抗暴」的報導以波蘭、匈牙利的抗暴為主；但 1957 年下半年以後，有關大陸各地（尤其蒙藏地區）抗暴活動的報導突然增加。

²⁵ 蔣介石 1953 年的元旦文告中，呼籲以「軍事第一，反攻第一」為反共抗俄工作的口號，「務使我陸海空三軍得到人力與物力充分的支持，隨時隨地都可對大陸匪區發動攻擊。」見《總集》，卷 33，頁 41。此後數年間，「軍事第一，反攻第一」即成為反攻的主要策略，見《宣傳週報》，卷 1 期 30（1953 年 2 月 20 日），頁 5。

²⁶ 《聯合報》，1957 年 10 月 10 日，第 1 版。

²⁷ 《宣傳週報》，卷 12 期 12（1958 年 9 月 19 日），頁 1。

故以他做了個別與擴大的宣傳。²⁸張春生原名張清榮，於 1957 年 12 月 17 日乘漁船到金門投誠，「是八年以來第一位反正歸來的共匪高級幹部，也是匪軍中響應 總統去年國慶文告號召匪軍起義來歸的第一人」，到台灣後他被升為上校、空軍高射砲兵司令部副參謀長。²⁹他在記者招待會中說「國軍一旦反攻，匪軍必紛來歸，目前匪軍士氣極為低落」，恰恰是國府要強調的重點。³⁰國府因此在 1958 年 1 月間，尤其是「自由日」前後，也就是在俞鴻鈞彈劾案風暴中，對他的事蹟著力宣傳，並請他到各部隊、單位演講「共匪暴政」，強調大陸同胞的苦難。

張春生的典範宣傳，顯然相當成功，因為他第一次的記者會連續舉行一個半鐘頭，《聯合報》說：「在場記者們都有一個感覺，那就是此人是一個說老實話，作老實事的人，因為記者們提出的問題，他知道的，都坦白答覆，不知道的，也誠懇的說：『不知道』或『不便說』。」³¹連美國的「百萬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One Million)都認為美國報紙不該忽視張春生投奔自由的消息，因為這消息「在遠東受到了廣大的注意而被視為是表明中共軍隊士氣低落及中國大陸爭取自由的運動的高漲的又一證明。」³²張春生在之後紀念「漢陽起義」的座談會中再度指出「匪軍內部現正陷於極端的矛盾中」，並與其他反共義士一起呼籲早日反攻大陸。³³

²⁸ 張春生的故事是 1 月 15 日台灣各報的頭版頭條。

²⁹ 見〈歡迎反共義士張春生大會講詞〉，1958 年 1 月 14 日，收入空軍總司令部編，《王叔銘將軍言論集》（出版地不詳：空軍總司令部，1958），頁 54-56。報導參見《聯合報》，1958 年 1 月 15 日，第 1 版。

³⁰ 《中央日報》，1958 年 1 月 15 日，第 1 版標題。

³¹ 《聯合報》，1958 年 1 月 15 日，第 3 版。

³² 《聯合報》，1958 年 2 月 3 日，第 2 版。此委員會原名為「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百萬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Red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是 1952 年成立的美國民間組織，原先主旨是要蒐集百萬人的簽名，要求美國不能支持中共取代中華民國為聯合國的會員。

³³ 《聯合報》，1958 年 8 月 23 日，第 3 版。《中央日報》，1958 年 9 月 2 日，第 2 版對張春生的發言有長篇的報導，但這是張春生最後一次公開的宣傳活動。中共於 10 月 25 日宣布「單打雙不打」政策後，他因為公開宣傳應「以和平之路倡導國共合作建設中國」而被捕，於 12 月底被槍決。總長王叔銘在日記中說：張春生雖然經憲兵司令部偵訊結果應該不是假降，「但其受毒太久，氣質難變。余以為已無留待運用之價值，決定予以秘密處置，由情報局執行之。」

1957年發生的「漢陽起義」則是國府1958年有關大陸「抗暴」活動宣傳的重點。從1955年開始，蘇聯與中共開始倡議和平共存，國際冷戰趨於緩和，這種轉變對國府執行較肅殺的「反共抗俄」與「反攻大陸」國策顯然不利。但1956年卻連續發生波蘭與匈牙利事件，故1956-1957年間，國府宣傳主軸之一即是鐵幕內的「反共抗暴」行動，並以此證明自由世界無法與國際共黨「和平共存」，而大陸內的反共抗暴將與國軍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配合。1957年6月間發生的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罷課事件，《人民日報》到8月初予以揭露，其內容顯示此為中共反右宣傳，尤其是批判章伯鈞、羅隆基（毛澤東指稱為「章羅聯盟」）的一部份，³⁴強調此事件打擊了右派民主黨派，並教育民主黨派要向左轉。但因報導中指出鬧事者貼出「共產黨走下坡路了，毛主席要下台了」、「歡迎國民黨趕快回來」、「歡迎蔣介石回來」、「到台灣去」等標語，³⁵被國府視為「反共抗暴」的典範。尤其在9月6日漢陽法院將漢陽一中副校長王建國、教導副主任楊松濤、教員鐘毓文三名「製造暴亂事件的現行反革命首惡份子」處死之後，國府正式將漢陽事件稱為「起義」。³⁶而《人民日報》把這事件稱為「小匈牙利事件」，卻無意中符合了國府「抗暴」宣傳的需要。例如胡適在1957年9月26日代表國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發表政策演說時，就將匈牙利事件與漢陽抗暴相提並論，《紐約時報》社論則指出胡適演講顯示：「目前中國大陸上的情形與匈牙利的情形相似」。³⁷

這個決定由蔣介石批准執行，見〈王叔銘將軍日記〉，冊20，1958年10月31日；〈王叔銘將軍日記〉，冊19，1958年12月4日、1958年12月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³⁴ 有關「章羅聯盟」，可參見章詒和，〈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上）、（下），「大紀元」網站 <http://epochtimes.com/b5/7/5/3/n1697716.htm>，2007年5月3日上網，2009年9月12日下載。

³⁵ 《人民日報》，1957年8月6日，第1版及〈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漢陽縣第一中學事件真相〉，《人民日報》，1957年8月8日，第4版。中共事隔將近兩個月才報導此事，而且在8到9月間對此事件有連串的報導，用意應該是要作為宣傳反右運動成果的例子。

³⁶ 《聯合報》，1957年9月14日，第3版；《中央日報》社論，1958年9月18日，第2版。

³⁷ 見《聯合報》，1957年9月27日、1957年9月28日的相關報導，引文為《聯合報》報導；《紐約時報》社論見“Hungary and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1957.09.27, p. 18.

到 1958 年間，也就是國府決定要將「反攻」與「抗暴」結合並加強宣傳後，漢陽事件成爲 6 到 9 月間的宣傳重點。在事件屆滿一週年時，國府將此事件的性質定調爲「新武昌起義」，並發動全國青年在各地舉行紀念會、座談會等各種活動，中國廣播公司也播出根據「實際情形」改編的「新武昌起義」廣播劇。³⁸中華民國各界對三烈士「殉難週年」的紀念活動，更是在一個月前就開始籌備。三人的週年忌日當天（9 月 6 日），金門雖已在中共砲火下陷入運補困境，但台灣各界還是舉辦了整日的紀念宣傳活動，從早上的萬人大集會、晚上的萬人晚會外，還有各文化工作隊宣傳列車二十餘輛，整日在台北市與近郊鄉鎮作化裝宣傳，演出街頭劇、布袋戲等節目。集會中包括義士、華僑、青年代表等發言，一致「呼籲全國團結力量，早日反攻大陸」。³⁹換句話說，砲戰的爆發，恰好提供了更適切結合反攻與抗暴雙面宣傳的情境。

除了藉用義士與大陸抗暴行動來宣傳外，蔣介石也數度親自向國外記者解釋反攻引發抗暴的概念。其實《自由中國》社論所稱：國府近期內反攻大陸的「公算不大」這一點，並不算獨特的見解。除了國府之外，絕大多數自由世界其他反共或非共國家，也認爲國府只能靠世界大戰或把美國捲入與中共大戰，才有可能重返大陸，而這樣的大戰，卻是自由世界各國所懼怕的。因此在砲戰之前，反攻將引發抗暴，不僅勝利有望且不會將美國或世界捲入大戰，是國府內外反攻宣傳的重點。5 月 25 日，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錄音訪問蔣介石，主持人說國府軍隊漸老、熱忱消失，部隊幾乎有一半是台灣人，加上受到物質的限制，問蔣在沒有大戰或美國直接支援下，國府能否以武力克服中共？蔣回答時強調：國府鬥爭的力量「是以人民反抗共匪殘害的意志和力量爲基本。……並不需要世界戰爭，或美國的直接參與。」即國府要用「三分軍事力量，七分政治力量」來達到目的。蔣也說中共在大陸愈久、控制愈強、壓迫愈強，會讓人民愈加痛恨，匈牙利式的革命在過

³⁸ 《宣傳週報》，卷 12 期 8（1958 年 8 月 22 日），頁 2-3。

³⁹ 《聯合報》，1958 年 8 月 13 日、1958 年 9 月 6 日、1958 年 9 月 7 日，第 3 版。

去兩年內已一再發生；一旦不滿情緒結集，不但大陸全民反共革命時間來臨，也是「我們幫助他們解放的時機」。⁴⁰

在此訪問之前一個多月，蔣介石在回答紐約《世界電訊暨太陽報》(World-Telegram and Sun)記者訪問時，也曾經強調同樣的論點。⁴¹事實上，蔣在5月初就信心十足的告訴西班牙記者，他相信反攻開始三個月內，大陸同胞一定會「相率響應」。⁴²到7月中，中東爆發危機，⁴³蔣介石又藉機向國外媒體強調：只有主動引起鐵幕內部革命，才能阻止共黨的間接侵略。⁴⁴在他看來，自由世界因應共黨的侵略與國民黨反攻大陸應該適用同樣的原則。故在砲戰爆發前夕，國府無論在作戰計畫與對內宣傳上，都認定中共進犯台澎金馬「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反攻大好時機」。⁴⁵

7月間中東危機爆發後，情報顯示中共海空部隊逐漸南移，並增加金馬對岸的長程大砲，台海局勢逐漸緊張。參謀總長王叔銘即指示要加強策動大陸同胞抗暴，以把握時機、配合中共發動攻擊時的反攻行動。⁴⁶7月底，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到北京與毛澤東會談，並於8月3日發表聯合公報。國府認為赫魯雪夫是去指示毛澤東配合中東危機，在亞洲發動新的侵略，最可能就是在台海地區挑釁，而一旦「朱毛在台灣海峽引發戰爭，那就是我們

⁴⁰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五月廿五日電視訪問節目錄音全文〉，1958年5月25日，700.1 情報司，總統言論，外交部檔案。報紙登載的中央社訊的問題，略去了記者的前言以及蔣迴避回答的問題。

⁴¹ 蔣中正，〈我反攻勝利可防止世界大戰〉，1958年4月14日，《總集》，卷39，頁102-103。

⁴² 《聯合報》，1958年5月13日，第1版。

⁴³ 伊拉克於1958年7月14日發生政變，推翻親西方的費賽爾國王，鄰近的黎巴嫩總統夏蒙向美國求援，美國乃派海軍陸戰隊於7月15日登陸黎巴嫩；英國傘兵部隊則在兩天後降落約旦，法國也派艦隊在黎巴嫩外海應變，蘇聯則同時宣布在黑海等地區舉行大規模三軍演習，國際局勢因而緊張。西方國家目的在防止親共勢力在中東的擴張，國府則將中東危機定調為蘇聯代理人（埃及的納瑟）在中東的間接侵略，也認為中共會受命在遠東有所行動，故令三軍警戒。見《宣傳週報》，卷12期4（1958年7月25日），頁4-5。

⁴⁴ 《宣傳週報》，卷12期6（1958年8月8日），頁1。

⁴⁵ 陸軍總司令彭孟緝，〈宣傳指示〉，1958年8月1日，收入國防部總政治部編，《台海戰役國軍政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頁119。

⁴⁶ 「國防部參謀總長交辦及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1958年7月17日，〈王叔銘個人資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反攻大陸的好機會」。⁴⁷而中共宣布剛開了兩個月的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還有揚言即將「解放台灣」的宣傳，更讓國府確信中共在台海大規模挑釁迫在眉睫。⁴⁸國府將這樣的訊息，向國內外各方面（尤其是外島）部隊不斷地重述，並鼓勵部隊要「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且要有殉國的決心，「只有犧牲奮鬥才能復興」。⁴⁹第四組所編的《宣傳週報》更發出「我們要準備作戰」的通告，號召軍民「面對現實，隨時準備作戰」，強調一旦開戰「我們決不單是被動的防禦，一定更主動的還擊」，也號召大陸軍民「隨時準備配合國軍反攻」。同時要求所有人民加強空防與疏散，以因應敵人的偷襲。⁵⁰換句話說，砲戰爆發前夕，國府在宣傳上不斷強調共黨「進犯在即」，但其行動將提供國府反攻的「機會」，配合誘發必然的大陸抗暴與解放軍掉轉槍口，反攻在即且有望。

二、砲戰期間的反攻大陸宣傳

8月23日，中共如預期地大舉砲擊金門，發動了為期兩個月的台海危機。危機的進展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危機高峰期（8月23日至9月6日）：在此兩週內，中共除以砲火封鎖金門外，並未積極進犯，因之國府的主要關注與努力，都在解決金門的運補問題。戰爭升高的危機，在9月初因為美方拋出願意談判的測風球，中共宣稱願意談判而暫時舒緩。接著是封鎖僵局下的全球「輿論戰」階段（9月7日至10月6日）：在此一個月間，危機升高的可能性雖然降低，但美國與中共都希望增加談判籌碼，故中共加強砲擊封鎖，美國則加強協助運補。另一方面，自由世界媒體則紛紛要求金馬中立、非軍事化或撤軍，以「徹底」解決外島問題。最後為危機舒緩階段（10月6日至10月25日）：中共意外地在10月6日宣布將停火一週，並以美國不護航為條件，讓

⁴⁷ 〈政治指示〉，1958年8月5日，收入《台海戰役國軍政工工作紀要》，頁16。

⁴⁸ 《宣傳週報》，卷12期7（1958年8月15日），頁3。

⁴⁹ 《台海戰役國軍政工工作紀要》，頁466-467。

⁵⁰ 《宣傳週報》，卷12期7（1958年8月15日），頁3；《宣傳週報》，卷12期8（1958年8月22日），頁4。

國府從容運補；一週期滿後，中共再宣布延長停火兩週。在此期間，美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應國府之邀，到台北與蔣介石會商，並於 10 月 23 日發表聯合公報，宣稱反攻主要不是憑藉武力。中共在兩日後，宣布對金門運補灘頭與機場採取「單日」砲擊的政策，危機落幕。

在危機的各個階段，內外的輿論對國府「反攻大陸」國策的挑戰，依次是：金門防衛與維持士氣問題（第一階段）、國際輿論壓力要求中立外島（從第二到第三階段），以及國共雙方放棄在台海使用武力，以舒緩引爆大戰可能（第三階段）。國府很快發現，中共砲火雖猛，但來自自由世界的「紙彈」挑戰更是嚴峻，幾乎比實彈還難以招架。以下依序討論國府因應危機宣傳焦點的轉變，以檢視砲戰對反攻大陸宣傳的影響。

（一）「金馬是反攻的跳板，不容匪俄侵犯！」⁵¹

砲擊開始後，國府仍接續砲戰前夕「反攻在即，且將引發抗暴」的宣傳主軸，並藉著加強宣傳美方領導人強硬的聲明，來鼓舞民心士氣，準備乘機反攻；甚至向美國內部的宣傳，也要「強調建設臺灣，即為反攻大陸之準備」。⁵²砲戰爆發第二天，《中央日報》即在頭版二條登出「某軍事觀察家指出，共匪瘋狂砲擊金門，顯係進犯行動前奏，認為決非尋常砲擊可比」的大幅報導，並在同版小篇報導「反攻消息傳遍大陸，人民喜形於色彼此奔走相告，匪幹寢食不安祇得各謀前程」。⁵³第三天，蔣經國向五百多位「海外僑生回國軍中服務隊」的隊員指出「反攻大陸時機即將來臨」，並由該服務隊具名，呼籲大陸青年「反攻時機即將到來」，要他們獻身戰鬥、消滅共匪。⁵⁴

接著國民黨中常會在 8 月 27 日通過「針對當前局勢在新聞宣傳（心戰）上應有之措施要點」，把中共砲擊的意圖定調為赫魯雪夫與毛澤東北京會談所

⁵¹ 〈八月份下半月影院幻燈標語〉，《宣傳週報》，卷 12 期 8（1958 年 8 月 22 日），頁 3。

⁵² 黃少谷、葉公超、沈錡聯合簽呈，1958 年 8 月 28 日，707.5 情報司，約雇萊特公司宣傳案，外交部檔案。

⁵³ 《中央日報》，1958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

⁵⁴ 《中央日報》，1958 年 8 月 25 日，第 3 版。

決定的「遠東及東南亞侵略之軍事、政治攻勢」。此要點指示各單位：在對內宣傳上要民眾加強戰時動員，而共匪來犯「即是我反攻革命戰爭的開始」；其次是穩定僑社支持祖國、呼籲大陸同胞「用行動起而抗暴，用生命換取自由」。國際宣傳上要提醒各國《蘇俄在中國》一書所分析警告的俄帝陰謀，並「力促民主國家注意俄匪全面動態、積極遏止侵略，迅即引發並支援鐵幕內之抗暴革命，以報復俄匪侵略。」⁵⁵先後到台灣的反共義士們，同一天也在紀念「漢陽起義」的籌備會上，公開呼籲早日反攻大陸。⁵⁶在國府領導人的預計與期望中，反攻戰端即將開啓。

雖然國府很清楚美國並未明確表示將協防外島，但在對內宣傳上卻強調美國在防約之下，有支持國府的義務，而「如共匪來犯，即是我反攻革命戰爭的開始」，輿論應該呼籲美國「加速援助我國反攻大陸，才可以獲得真正持久的和平」。⁵⁷除了報紙報導外，王叔銘總長並指示將艾森豪記者會、第七艦隊活動等重要新聞內容，透過廣播或指揮官的轉述，轉告外島官兵，以鼓舞士氣，堅守金門，「為反攻大陸立下必勝的基礎」；⁵⁸部隊也被提醒：「金門為反攻大陸之跳板」，中共只要進犯金門，就會「開啓反攻大陸之機運」。⁵⁹國府還透過舉行與各界菁英舉行時事座談，以加強民間動員的方式，希望激起「反共戰鬥宣傳之高潮」。⁶⁰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⁶¹更在 9 月 1 日的記者節慶祝大

⁵⁵ 《宣傳週報》，卷 12 期 11（1958 年 9 月 12 日），頁 1-2。

⁵⁶ 《聯合報》，1958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⁵⁷ 《宣傳週報》，卷 12 期 10（1958 年 9 月 5 日），頁 6；王叔銘，〈告福建前線朱毛軍弟兄書〉，1958 年 9 月 1 日，收入《台海戰役國軍政工工作紀要》，頁 29-30。

⁵⁸ 國防部參謀總長交辦及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1958 年 8 月 28 日，〈王叔銘個人資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講話大綱（第四號），1958 年 8 月 30 日，收入《台海戰役國軍政工工作紀要》，頁 468-470。

⁵⁹ 彭孟緝，〈宣傳指示〉，1958 年 9 月 1 日，收入《台海戰役國軍政工工作紀要》，頁 141-142。

⁶⁰ 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78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9 月 1 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以下簡稱黨史館藏）。座談會對象除了黨幹部外，還包括大專教授、文化新聞界工作人士、社團負責人與婦女界，並讓陶希聖、黃少谷、馬紀壯、蔣堅忍、陳建中等分別主講，見「對當前時局舉行座談會要點」，1958 年 8 月 28 日，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80 次會議紀錄附件，1958 年 9 月 10 日，黨史館藏。

⁶¹ 之前被彈劾的俞鴻鈞於 6 月底再度辭職獲准，副總統陳誠於 7 月 15 日起兼任行政院長。

會中，大聲宣稱：對中共進犯的政策是「還擊」，而最終的目標是「勝利」；他也強調「阻止敵人的戰爭恫嚇與軍事冒險，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出力量來抵抗，並作有力的反擊。」⁶²簡言之，到9月6日「漢陽起義」週年紀念為止，國府都持續砲戰前抗暴與反攻結合的宣傳，也聲稱中共攻擊即是國府反擊與反攻的時機。但就在當天，美國與中共顯示願意恢復大使級談判，危機高峰過去，而反攻時機迫在眉睫的宣傳，也在局勢推演下逐漸轉變成以鼓舞士氣、保住金門為主。

（二）「支援前線，確保金馬！」⁶³

經過兩週時疏時密的砲擊，台海危機逐漸演變成封鎖金門之勢，加上美國極力禁止國府向大陸報復性攻擊，國府不得不逐漸放棄藉中共攻擊觸發反攻契機的期望與計畫。9月初，北京與華府在隔空交換硬中帶軟的指控後，決定恢復中斷將近一年的大使級談判，地點改在波蘭首都華沙。⁶⁴在此同時，國府也因中共砲火有效封鎖了金門的運補，加上國際與美國輿論對協防外島恐將引起大戰的疑慮與日俱增，國內媒體卻要求積極反擊中共的砲火。國府在「紙彈」猛烈攻擊、且透過美國外交管道輾轉施壓下，乃逐漸將宣傳的焦點，從反攻的立即與必然性，轉為因應華沙會談可能造成的傷害，以及「任何情形下不從外島撤退」。⁶⁵

其實國際輿論一開始還主張應該要堅定地回應中共砲擊，例如《紐約時報》一篇社論指出：中共的目的是要使自由世界不安，「讓我們失去平衡」；美國採取明顯的防禦措施是正確的，若向共黨欲製造的慌亂低頭，那就錯了。⁶⁶但這樣堅定的立場沒有維持多久，一個星期後，國際輿論就開始出現恐戰與懷疑

⁶² 《聯合報》，1958年9月2日，第1版。

⁶³ 〈支援金馬標語口號〉，《宣傳週報》，卷12期15（1958年10月10日），頁7。

⁶⁴ 1955年8月1日，美國與中共在日內瓦開始大使級談判，到1957年底談判形同終止；9月6日，周恩來聲明願意與美方重開大使談判，談判於9月15日重開。

⁶⁵ 《台海戰役國軍政工作紀要》，頁470-471。

⁶⁶ “No Time for Jitters,”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1958.08.29, p. 22。

外島戰略價值的聲音。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與《巴爾第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即指出國府若能以撤出外島換取中共不在台海使用武力，代價算是很低。⁶⁷為了因應對美國協防外島的質疑，艾森豪與杜勒斯連續公開解釋美國立場，不過為了防止衝突擴大，往往在不妥協的冷戰語彙中，夾雜著以「維持和平」為最高準則的實際。其中艾森豪 9 月 11 日的電視廣播演說，甚至說相信有若干措施可以讓外島不致成為「和平的障礙」(thorn in the side of peace)。⁶⁸如此一來，西方媒體一方面批評美國立場的曖昧可能導致更大衝突，一方面卻逐漸發展出以國府撤出外島、去除「和平的障礙」，以換取中共不在台海地區使用武力聲明的呼籲，希望可以解決危機。⁶⁹例如《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即以連日社論指責國府要拖美國下水，主張金馬應該歸大陸；其他報紙也恐懼保衛外島將引發大戰、呼籲美國與國府應考慮撤出外島；各報讀者投書則多半反對美國協防金馬。⁷⁰英國工黨則發表聲明：「英國輿論不會支持保護外島的戰爭；這個國家無論黨派不都會支持美國不認清蔣介石不正常地位的鴛鴦政策。」其黨魁甚至形容為外島冒大戰的作為是「罪惡性的愚蠢」(criminal folly)。民眾寫信給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表示選民不分黨派都會支持這個立場。⁷¹日本《每日新聞》甚至以全版大標題報導未經證實的新聞：即英、日外相協議金門、馬祖應屬中共，兩者聯合要求美國接受這個立場，這樣的報導顯示國際輿論的趨向。⁷²

⁶⁷ 見第 821 號電，1958 年 9 月 10 日，大使館致外交部，429 北美司，金馬事件（六），外交部檔案。

⁶⁸ 艾森豪的演講稿全文譯本見《聯合報》，1958 年 9 月 13 日，第 2 版。

⁶⁹ 中央社報導杜勒斯 1958 年 9 月 9 日記者會所引起的美國媒體推測，〈央秘參〉，1958 年 9 月 13 日；另見駐美大使館報告美國輿論走向的第 821 號電，大使館致外交部，1958 年 9 月 10 日；兩者均收入 429 北美司，金馬事件（六），外交部檔案。

⁷⁰ 見葉公超大使摘要美國主要媒體對外島問題的看法，第 866 號電，葉公超致外交部，1958 年 9 月 24 日，405.21 北美司，美匪華沙會談（五），外交部檔案。另見“Excerpt from U.S. Editorial Opinion Questioning, or Critical of, U.S. Policy on Quemoy-Matsu (September 9 to 26),” 1958.09.26, f: Quemoy-Matsu 1958, Hagerty Papers, box 9, Eisenhower Library。

⁷¹ Letter to the Editor, 1958.09.19, *The Times*, p. 11; “‘Criminal Folly’ To Fight Over Quemoy,” *The Times*, 1958.09.22, p. 4.

⁷² 見〈央秘參〉，1958 年 9 月 20 日，019.2 亞太司，台灣海峽（一），外交部檔案。雖然英、

國際輿論外，國內各方面也給國府不小的壓力。最初國府高層爲了不讓中共在危機期間分化「中美合作關係」，以維持士氣、加強軍民向心力，故對美方意含退讓的各種聲明，以及美國與中共的談判，都儘量避免公開批評，或只在必要時低調回應。⁷³但台灣內部輿論卻對美國曖昧的立場與華沙談判紛紛表示疑懼，也認爲不積極突破封鎖等於束手挨打。如《聯合報》指出：國府必須主動反擊，對歷史才有交代，指出美國聲明中的破綻與曖昧，且自由中國全體居民與僑胞「不僅對友邦行動之遲緩與缺乏實效感覺不滿，並且對政府也不能諒解」；《徵信新聞》也強調美國聲明中「時濃時淡的姑息氣息」，艾森豪雖然說不會重蹈慕尼黑的覆轍，但與中共談判下去會導致「某種形式某種程度的慕尼黑歷史重演」；而一向較有批判性的《公論報》卻要國府聲明談判不能「妨礙我們反攻復國的大計」。⁷⁴

國內媒體壓力外，立委、國代們則紛紛要求國府立即反擊、趁機反攻。國大代表在 9 月 15 日，即華沙會談開始之日，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聲稱「外島爲我反攻大陸的跳板，亦爲防衛台澎以及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前哨」，並要求國府與美國立即「轟炸匪區沿岸，澈底摧毀匪軍的砲兵陣地」以解決外島運補問題。⁷⁵第二天，立法委員在施政質詢時則要求國府不能繼續被動挨打，指出美國與中共談判本身就已經損害了國府的權益，應要求停止談判；並聲稱「我們必須反攻，始能生存」，要求國府應該「趁機反攻」。⁷⁶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加上砲火有效地封鎖了金門的運補等情勢，都逐漸讓國府意識到：除非能扭轉

⁷³ 日官方否認這個協議，但日本報紙大幅刊載顯示的是輿論的態度，見同檔內的其他後續報導。例見黃少谷部長聲明，《聯合報》，1958 年 9 月 8 日，第 1 版。

⁷⁴ 《聯合報》社論，1958 年 9 月 8 日、1958 年 9 月 10 日、1958 年 9 月 11 日、1958 年 9 月 13 日、1958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徵信新聞》社論，1958 年 9 月 8 日、1958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公論報》社論，1958 年 9 月 11 日，第 1 版。

⁷⁵ 國代聲明見《聯合報》，1958 年 9 月 16 日，第 3 版。

⁷⁶ 對立委這些質疑與建議，陳誠只能回應：「政府雖盡了最大之努力，但是不合理想不能令人如意的是恐怕仍有很多，今天我對大家只說一句話，就是我們需要忍耐，但忍耐一定要有個限度。」〈立法院院會速記錄〉，1958 年 9 月 16 日，《立法院公報》，卷 22 期 2（1958 年 9 月），頁 11-25。

情勢，外島恐將不保，遑論反攻。⁷⁷而國府宣傳的焦點，也在9月中之後，被迫從反攻在即的呼籲轉移到金馬保衛戰對國家存亡、亞洲與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上。

為了回應輿論的壓力，國府開始由高層出面喊話，以求減輕外島撤軍的壓力。首先是陳誠藉著施政報告的機會，聲明對金馬價值的懷疑是「共匪政治攻勢」所造成，但呼籲國人要諒解美國的環境和困難、信任美國的智慧 and 決心，以免被共黨分化；同時警告自己的苟安心理與國際姑息主義一樣，會鼓勵侵略。在這篇政策性的報告中，陳誠和緩地修改了自己半個月前宣稱的「還擊」策略，改為堅守防線的「作戰到底」。⁷⁸

陳誠施政報告的同一天，蔣介石接受了紐約《美國人報》(American)的書面訪問。蔣指稱外島危機是赫魯雪夫與毛澤東8月初會談的結果，是共黨集團擴張侵略的一部份，金馬是拿台灣的第一步，台灣則是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鎖鑰——即外島不但不是「和平的障礙」，反而是「自由的屏障」；他還否認國府受到防約的約束或妨礙，也說深信到了生死關頭美國「絕對不會」妨礙金門守軍自衛或採取報復行動。⁷⁹換句話說：陳誠與蔣介石都試圖以強調台海危機的冷戰面向，並訴諸美國的道德性與美國、國府間盟約的堅定，來處理外島的實際與宣傳困境。除了國府總統、副總統的聲明外，新任駐美大使葉公超，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以及正在美國治病的蔣夫人宋美齡，也都藉著不同的管道，直接向美國媒體重述國府的立場，希望至少可以增加美國輿論對堅守外島的支持。⁸⁰

但國府高層的聲明或向美國媒體的呼籲，並未降低國際或美國輿論的恐戰傾向，以及要求徹底解決外島問題的壓力。《紐約時報》指出絕大多數（八成以上）民眾寄給國會議員與國務院有關外島問題的信，都反對美國協防外島的

⁷⁷ 國府對中共意圖與國際反應的評估，可見北美司說帖：〈台海新形勢與共匪之新動向〉，1958年9月13日，429北美司，外島，外交部檔案。

⁷⁸ 〈陳兼院長昨在立院施政報告全文〉，《聯合報》，1958年9月16日，第6版。

⁷⁹ 問答全文譯本見《聯合報》，1958年9月17日，第1版。

⁸⁰ 可參見1958年9月下旬《聯合報》的相關報導。

立場；⁸¹而該報在這段期間所刊出的讀者來函，幾乎都對華府協防外島政策持負面評價；⁸²其他主要報紙的讀者投書，也以反對協防金馬者居多。⁸³葉公超 9 月 28 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公司「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電視廣播訪問時，記者更是咄咄逼人地質問：如果需要那麼多美國協助才能守金馬，「怎能真的談到有朝一日重新征服大陸的可能？」國府為何不反擊大陸？又，國府既然接受美援，又宣稱愛好和平，是否應該在政治上讓點步以解決危機？⁸⁴言下之意，國府應該放棄外島與反攻，接受兩個中國，以去除「和平的障礙」。這些在在顯示國府在撤退外島問題上面對的宣傳困境。

(三)「反攻的基地在大陸人心！」⁸⁵

到了 9 月 21 日，國府在美國的協助下，將美國提供的八吋榴彈砲以及其他補給品運送到金門，外島封鎖與陷落危機略微舒緩，蔣介石這才有心力集中處理輿論「紙彈」的挑戰。9 月 22 日，他主持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總統府宣傳會談；兩天後又主持中常會，討論戰時宣傳問題，並決定在 9 月 29 日親自舉行記者招待會，以回應眾多外國記者接見的請求。⁸⁶在這兩個會議中，國府決定由於國際輿論的恐戰傾向，在宣傳上必須重新釐清外島的作用與價值：「在當前國際環境下，暫宜避免提及『反攻』，而應代之以『還擊』、『報復』一類；且不宜說到『金馬是反攻大陸之前哨』、『為反攻大陸之跳板』等」。反之，要強調「反攻大陸之基礎在於大陸上之民眾」，金馬則是西太平洋的屏障，

⁸¹ *The New York Times*, 1958.09.26, p. 2; 1958.09.27, p. 1。

⁸² 例如有位讀者認為：支持國府是吃了迷幻藥，不正視現實；美國應撤出台灣，在聯合國提案讓台灣獨立於國府與中共之外，才是徹底解決之道。見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New York Times*, 1958.09.28, p. E8。

⁸³ 第 866 號電，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1958 年 9 月 24 日，405.21 北美司，美匪華沙會談（五），外交部檔案。

⁸⁴ 訪問內容見駐美大使館代電，1958 年 10 月 1 日，707.5 情報司，我對外宣傳（一），外交部檔案。

⁸⁵ 此引文為蔣介石 9 月 29 日記者會的主要宣示，日後成為宣傳的概念，但非直接引用語。見蔣總統答記者問全文，《聯合報》，1958 年 9 月 30 日，第 2 版。

⁸⁶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9 月 22 日，胡佛檔案館藏；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84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9 月 24 日，黨史館藏。

故必須防衛。此外，還要讓全球清楚理解：台海緊張全是由「俄帝走狗朱毛匪幫發動攻擊所致」；並強調未來無論對中共作戰或保衛金馬台澎，都不需要美國地面部隊參加等等，希望以此「打破美國人民為我反攻大陸而犧牲其子弟之疑慮」。⁸⁷

9月29日的記者會是蔣介石數年來的第一次，共有83位各國記者參加，歷時一個半小時，採取即席問答的形式。記者們發問的焦點，在美國對國府反擊的約束、金門補給問題，以及國府對華沙會談與聯合國討論外島問題的態度。蔣介石在回答時重複聲明金門軍民忍耐、忍痛是為了中美合作精神，但到生死關頭會使用緊急自衛權，美國應該不會反對，且絕對不會要求美國地面部隊加入戰鬥。他認為華沙會談不會有結果，不反對聯合國如同韓戰時一樣，討論中共侵略外島問題。此外，他還強調金門與中東是共黨集團的整體策略，目標都在打擊美國；但中共內部衰弱，只要擴大戰爭，三個月內反共革命一定起來推翻中共。最後，在沒人提問下的情況下，他自行聲明：「金門不是反攻的跳板」，而是屏障台海、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自由光明燈塔；而「我們反攻的基地完全在大陸人心」。他解釋說：金門當面敵人兵力大過國軍三倍、工事堅固，如同二戰時聯軍繞過英倫海峽、從諾曼地登陸一樣，反攻大陸也不會這樣「愚蠢」地從金馬去攻堅。⁸⁸

蔣介石的說法已經是他最大的讓步。早在1952年初，金門就已經開始被宣傳為「反攻的跳板」；砲彈爆發前夕，「金馬是反攻的跳板，不容匪俄侵犯」仍然是響亮的宣傳口號。⁸⁹蔣希望以此讓步來舒緩因恐戰而要求國府放棄金馬或減防的國際輿論壓力。《紐約時報》連續兩天報導了此記者會的內容，重點

⁸⁷ 宣傳通報第二五二號，1958年9月25日，729.83情報司，金馬戰局（一），外交部檔案。通報顯示：言論自制的理由是「為求與友邦外交協調」。

⁸⁸ 總統記者招待會談話實況，1958年9月29日，729.83情報司，金馬戰局（二），外交部檔案。這是根據中廣錄音所謄出的稿子。但中央社發出的記者會新聞稿，卻虛擬了問題「問：中華民國政府是否以金馬諸島為反攻的基地？反攻大陸的主要條件為何？」見〈蔣總統答記者問全文〉，《聯合報》，1958年9月30日，第2版。

⁸⁹ 〈訪金門胡璉將軍〉，《聯合報》，1952年3月28日，第2版；〈八月份下半月影院幻燈標語〉，《宣傳週報》，卷12期8（1958年8月22日），頁3。

也恰如蔣所希望的。⁹⁰第二天，《中央日報》社論則摘要並強化了記者會的重點；同日，蔣廷黻也向聯合國大會重述：國府不會主動出兵奪取中共政權，但只要大陸人民像匈牙利人一樣抗暴，國府一定會協助。⁹¹這樣的重述，除希望能舒緩美國被捲入大戰的恐懼外，也重申了國府保住金馬的決心。

儘管蔣介石的記者會看來成功，⁹²不過這些高層聲明，不但讓國內或僑報認為等於公開承認「反攻無望」，也沒有舒緩國際間要求國府放棄外島或至少減防的壓力。例如《自由中國》派的人私下認為蔣介石與蔣廷黻的說法「完全是反攻無望之意」；⁹³其社論則公開指責，「儘管政府過去無時無刻不在強調反攻，但危機發生後反攻的話，似乎說得更少，卻反而勸告人民要忍耐，也勸告輿論界不要過於高調。」⁹⁴紐約《世界電訊報》報導蔣廷黻演講的大標題是：「蔣總統助手在聯合國聲言放棄反攻大陸」，這讓「紐約的華人社會群情大譁」。⁹⁵紐約《美洲日報》總經理李覺之寫信給僑委會主委鄭彥棻，說僑界反共情緒熱烈，咸望政府早日反攻，蔣介石、蔣廷黻、葉公超等人言論分歧，讓他們無所適從。⁹⁶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這時還建議國府應趁機宣布開始反攻，陳誠只能委婉地解釋說：「反共抗俄戰爭是長期性的」，不能憑一時意氣，當時「在政治上尚未至宣布開始反攻之適當時機」，大家只能盡責造成有利之「勢」，真正反攻還得配合國際形勢的發展。⁹⁷顯然國府之前大力宣揚反攻在即，到隨時勢變化不得不作委婉調適時，卻在內部引發相當大的困境。

⁹⁰ *The New York Times*, 1958.09.29, p. 1; *The New York Times*, 1958.09.30, p. 3.

⁹¹ 《中央日報》社論，1958年9月30日，第2版；*The New York Times*, 1958.10.01, p. 13。

⁹² 莊萊德向國務院報告此記者會很成功，見 Tel.508, Taipei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958.09.30, 793.00/9-3058, RG 59, NA。

⁹³ 雷震與他的朋友們也認為蔣介石、蔣廷黻的說法顯示《自由中國》之前的說法是對的。見雷震，《雷震日記(1957-1958)》，1958年9月30日、1958年10月3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卷39，頁376、378。

⁹⁴ 〈論臺海危機〉，《自由中國》社論，卷19期7（1958年10月1日），頁3-5。

⁹⁵ 毛樹清，〈蔣廷黻博士有口難辯〉，《聯合報》，1958年11月10日，第2版。

⁹⁶ 李覺之致鄭彥棻函，1958年9月30日；黃少谷致鄭彥棻函，1958年10月17日；收入707.5情報司，金馬局勢對外宣傳，外交部檔案。

⁹⁷ 「金馬戰局和國際情勢」，1958年9月14日，〈石叟言論集，第28集〉，收入陳誠，《石叟叢書》，國史館藏。

爲了凝聚向心力，同時也以「國內民意」來回應國際輿論壓力，國府乃發起「全國各界支援金馬前線運動」，期望藉著國內民意的展現，在「紙彈」攻擊中，增加保住金馬的力量。⁹⁸只是在台灣內部要求國府積極行動的同時，國外對放棄外島的壓力卻絲毫未減。在蔣介石記者會的當天，美國副國務卿赫特(Christian A. Herter)在演講中指出：雖然外島在戰略上無法防衛，但國府對這些外島有「近乎病態」的執著。⁹⁹第二天，杜勒斯舉行記者會，與會者關懷的焦點還是在台海問題。由於蔣介石曾說美國贊成國府在金馬駐重軍，記者乃追問美國立場以及當時是否該撤出外島？杜勒斯說美國只是默認、並未贊成外島駐重軍；他不贊成在威脅下撤軍，不過若能得到「可靠的停火」，「在外島駐這麼多部隊是愚蠢的(foolish)。我們原先就認爲駐防這麼多部隊是愚蠢的。……在停火的狀態下，我們，甚至軍方的判斷都認爲，把部隊留在外島是不聰明、不謹慎的(not be wise or prudent)。」

杜勒斯既然連說兩次外島駐重軍是「愚蠢」的，美國各大報不免要拿此來作文章。《紐約時報》在第一版用斗大的標題寫著：「若中共接受停火 杜勒斯希望減少金門守軍」，新聞摘要則只強調杜勒斯認爲「一開始在外島駐紮這麼多部隊是相當愚蠢的」；以下幾日的相關報導更是不斷重述這個「愚蠢」說。另外，當記者問美國是否認爲國府某日將以某種方式回到大陸時，杜勒斯的回答是「這是高度假設性的問題，得看大陸的情勢而定」。他以匈牙利抗暴爲例，不排除大陸發生某些變化時，會導致兩岸統一的可能。但《紐約時報》卻將此段問答的標題寫成「台灣被斥責：國務卿懷疑蔣贏回大陸的能力」，並在報導中強調美國認爲國府返回大陸是「高度假設性的」。¹⁰⁰這當然不是杜勒斯回答的原意，但這樣的曲解反映出當時美國輿論界不但認爲沒有必要保金馬，也質

⁹⁸ 運動委員會於國慶日正式成立，於以下幾月間展開各種捐獻、義賣、勞軍活動。詳細內容可參見 1958 年 10-12 月間《聯合報》的相關報導。

⁹⁹ *The New York Times*, 1958.09.30, p. 5.

¹⁰⁰ *The New York Times*, 1958.10.01, 1958.10.01, pp. 1-2. 杜勒斯聲明的原文見“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September 3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9:1008 (October 20, 1958), pp. 597-604.

疑國府的反攻大陸政策。

蔣介石沒料到杜勒斯對外島的態度會有這樣劇烈的轉變，¹⁰¹在得知的當下就向美聯社記者表示「難以置信」，指出杜勒斯的說法與他一貫立場有出入，也與國府的立場不符。¹⁰²他還說：「假定杜勒斯先生真的說了那句話，那亦只是片面的聲明，我國政府並無接受的義務，但我們相信杜勒斯先生對我們是誠意的，對於我們的奮鬥，亦有信心。」¹⁰³外交部發言人也聲明：中共屢次表示不接受停火，「在軍事上仍需以重兵駐防外島」。¹⁰⁴私底下，蔣介石則向美國大使大發脾氣，認為不顧中共在對岸增兵，卻公開要金門裁軍是「最不公平、不道德之言行」。¹⁰⁵儘管艾森豪接下幾天連續公開表示不會在武力下退縮，國務院公開、私下也都保證美國政策並未改變，但國府並不信任此保證。¹⁰⁶因此在之後一週內，蔣介石、陳誠連續接見美、英、法各國的記者，重述國府的立場，希望透過道德呼籲、堅定表示，以及重新定義國府「反攻」的概念和國府無意讓戰爭擴大、捲入美國的各種聲明，舒緩要求外島減防或撤防的壓力。¹⁰⁷《中央日報》則在社論中演繹蔣介石記者會的重點，以爭取人民對國府立場與台海戰爭性質的理解。¹⁰⁸在努力保住金馬及與美國合作關係的宣傳中，國府雖未改變反攻大陸的國策，卻逐漸改變了其執行的前提與概念。

9 月底到 10 月初的一週中，美台雙方爲了金馬撤軍與反攻大陸問題展開

¹⁰¹ 蔣 11 月間反省此段經過，認為「如無杜勒斯態度之突然轉變，則可說對於俄共封鎖金門之奪取台澎陰謀，已建立其擊破之基礎。」也認為「不料卅日杜勒斯出乎意外之惡態，殊爲可歎！」見上月反省錄（1958 年 11 月 6 日記），〈蔣介石日記〉，1958 年 9 月 30 日，胡佛檔案館藏。

¹⁰² 蔣介石自言他是從早先安排好要訪問他的美聯社記者口中，得知杜勒斯「有此謬論」，當下立即反應，自認為這樣的反應對華府有相當影響。見〈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0 月 1 日及上星期反省錄，1958 年 10 月 4 日，胡佛檔案館藏。

¹⁰³ 蔣的訪問稿見《聯合報》與《中央日報》，1958 年 10 月 2 日，頭版頭條。

¹⁰⁴ 《聯合報》，1958 年 10 月 2 日，第 1 版。

¹⁰⁵ 蔣介石莊萊德談話紀錄，1958 年 10 月 2 日，429 北美司，金馬事件（三），外交部檔案。

¹⁰⁶ *The New York Times*, 1958.10.02, p. 1. 另見《中央日報》，1958 年 10 月 4 日、1958 年 10 月 5 日，第 1 版。

¹⁰⁷ 國府希望美方媒體理解的重點，可見外交部致紐約總領事游建文的第 129 號電，1958 年 10 月 1 日，729.83 情報司，金馬戰局（一），外交部檔案。

¹⁰⁸ 見《中央日報》，1958 年 9 月 30 日至 1958 年 10 月 4 日的相關社論。

激烈的隔空交鋒，看來一時難有交集。但國際間有關外島問題的「紙彈攻勢」，卻讓毛澤東改變了對金馬與「解放台灣」的思惟與策略，決定暫時將金馬外島暫時留在國府手中，將來「一攬子」解決台灣問題，以免美國強迫國府撤出金馬、劃峽為界，真正的製造出「兩個中國」。¹⁰⁹10月6日，中共發表了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宣稱將在沒有美國護航的條件下，暫時停火七天，讓金門可以順利補給。¹¹⁰台海危機自此進入了「政治戰」（宣傳戰）的階段。

（四）「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¹¹¹

10月間，當國府正忙著撲滅燎原的「金馬撤軍」之火時，中共的一篇停火聲明當下讓國府機警地將宣傳轉向。雖然中共主動宣布停火讓國府宣稱得到「第一回合的勝利」，但《告台灣同胞書》強調「美國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你們不信嗎？歷史巨人會要出來作證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談話，端倪已見。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這樣的說法讓國府警覺到：中共單方宣布停火的主要意圖是趁著蔣、杜隔空喊話之際，加碼分化；國府若持續與美方爭執，正好中了中共的計謀。不過防止中共分化外，國府還是得持續澄清反攻的立場，以因應停火後還持續的放棄外島聲浪。

中共停火前，蔣介石「金馬非反攻跳板」、「反攻主要基地在大陸人心」的說法，得到了一貫認為國府應實施政治改革，以吸引大陸民心，執行「政治反攻」的非黨營媒體的支持。¹¹²之前寫出「反攻無望論」的《自由中國》社論作者殷海光藉機指出：國際氣氛不利軍事行動，「我們怎能赤裸裸地發動武力反攻大陸呢？」他認為國府當前只能積極改造其統治方式，取消一黨專政，以與大陸的極權相對照，讓大陸人民在內心維持對共黨的反抗，適當時機化為行動。這是因應國際間避免戰禍、美國維持和平先於反共，與中共和談攻勢的最

¹⁰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177-179。

¹¹⁰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6日，第1版。

¹¹¹ 《宣傳週報》，卷12期12（1958年9月19日），頁1。

¹¹² 見《聯合報》、《公論報》與《自由中國》，1958年10月1日至1958年10月4日的社論。

好策略。¹¹³《聯合報》社論呼應這個說法，認為將重點從軍事反攻移置於政治反攻才是「正確的努力方向」，國府應「用政治的力量來為軍事力量製造開拓復國機運的條件」，也就是加緊「從推展民主憲政中求進步求團結」，以便「在政治上開展反共抗俄大業」。¹¹⁴

黨營的《中央日報》則以兩篇社論來「闡述」蔣的概念，指出革命的基礎在廣大民眾，「革命的要求也就是代表了全國民眾的要求」；故反攻復國不全靠現有武力，「而是要靠大陸現雖隱忍有待終將普遍爆發而沛然莫之能禦的一股廣大民眾的向心力」，故「不是非以金馬為反攻跳板即無法反攻」。¹¹⁵國民黨指示其海外工作會在宣傳時「強調我們反攻基地在大陸民心」；¹¹⁶蔣介石自己也趁著國慶的機會激勵人民：只要中共再度攻擊外島，就給大陸人民群起反抗的機會，也就是反攻的時機。¹¹⁷一時之間，台灣朝野對以抗暴引發反攻的策略似乎逐漸有了默契。國府也略微轉變了之前以軍事反攻引發抗暴的思惟，10月中以後的反攻宣傳重點遂轉成：抗暴先於軍事反攻、需要時機成熟，故行動或策略的重點在「如何迅速引發大陸革命」。¹¹⁸

以引發大陸抗暴為主，軍事反攻為輔的想法，在杜勒斯 10 月下旬訪台後正式落實。會談時杜勒斯指出：國際與美國輿論擔心國府製造大戰，故希望國府能就外島問題表示和平意願。蔣介石的回應是：光復大陸不能單用武力，而須以大陸人民支持為基礎，故他的主要「職責」是幫助大陸「反共革命武力之滋長」，作光復大陸的先聲，他絕未打算藉發動大戰、捲入美國以返回大陸。¹¹⁹就在兩人會談的同時，國府配合激起大陸抗暴為反攻前導的思惟，利用 10 月

¹¹³ 《自由中國》社論，卷 19 期 8（1958 年 10 月 16 日），頁 3-6。

¹¹⁴ 《聯合報》社論，1958 年 10 月 1 日、1958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¹¹⁵ 《中央日報》社論，1958 年 9 月 30 日、1958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¹¹⁶ 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88 次會議紀錄附件，1958 年 10 月 8 日，黨史館藏。

¹¹⁷ 《聯合報》，1958 年 10 月 10 日，第 1 版。

¹¹⁸ 《台海戰役國軍政工作紀要》，頁 68-75。

¹¹⁹ 蔣介石杜勒斯談話摘要紀錄，1958 年 10 月 21 日，407.1 北美司，總統談話資料（三），外交部檔案。

23 日的匈牙利抗暴二週年，舉行紀念活動、加強宣傳。¹²⁰杜勒斯既然在 9 月 30 日的記者會中，表明不能排除當大陸發展出匈牙利式的抗暴時，國府有藉機返回大陸的可能，國府馬上積極將當前的中國問題與匈牙利作連結。《中央日報》社論指出要避免世界大戰並摧毀侵略勢力，唯一有效的辦法為支援鐵幕內的革命運動。《聯合報》社論也呼應：「無論站在道義立場或利害觀點，自由世界都不能對鐵幕人民的英勇抗爭，袖手旁觀。」¹²¹10 月 23 日早上的紀念大會則呼籲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要「負起支援鐵幕內人民反共革命的責任」，以結合鐵幕內外反共力量、消滅共產侵略。立法院長張道藩在致詞中，希望匈牙利人民「再掀起抗暴的怒火」；陳誠則在書面致詞中要求全民支援前線，並策應大陸革命，支援鐵幕內人民抗暴，「以共同爭取反共抗俄之勝利」。大會宣言也呼籲全球採取有效行動，逼蘇俄軍隊退出匈牙利，同時強調金馬保衛戰是反共抗俄鬥爭第一線，自由世界更應積極支援，¹²²希望以此將全球的「反共抗暴」與反攻大陸作連結。

紀念會召開的當天下午兩點，蔣介石與杜勒斯發表了被認為是國府「放棄武力反攻大陸」聲明的聯合公報，在公報相關的辯論與宣傳中，國府更進一步轉移了反攻宣傳的重點。公報中有關反攻的部份，在美國有意引導與媒體推波助瀾下，成為當時全球矚目的焦點，其中、英文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iders that the restoration of freedom to its people on the mainland is its sacred mission. It believ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is mission resides in the minds and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at

¹²⁰ 見居浩然，〈匈牙利革命的教訓〉，《聯合報》，1957 年 10 月 23 日，第 4 版，以及同日標題均為〈匈牙利革命一週年〉的《聯合報》與《中央日報》社論。

¹²¹ 《聯合報》社論，1958 年 10 月 23 日，第 2 版；《中央日報》社論，1958 年 10 月 23 日，第 2 版。

¹²² 《聯合報》，1958 年 10 月 24 日，第 3 版。

the principal means of successfully achieving its mission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the use of force.¹²³(底線為筆者所加)

字面上看來，這段文字的意涵與國府之前「反攻主要基地在大陸人心」的說法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將「反攻大陸」與「實行三民主義」相連結，本來就是國民黨「國民革命第三期」的基本概念，公報中文的用語也是根據蔣介石的意思。¹²⁴公報發表當天發出的「宣傳通報」顯示，國府認為蔣介石與杜勒斯的會談及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已經達到國府期望的政策與宣傳目的：即保住金馬、破壞中共分化陰謀、確認國府代表中國的正統性，及宣示反攻神聖使命。¹²⁵換句話說，國府認為公報這幾點正好可以紓解其當時的困境，故蔣介石在公報定稿後向杜勒斯說「今後雙方宣傳亦應大致照聯合公報之方針進行」。對此提議，杜勒斯當然是「欣然同意」，¹²⁶因為他在訪台前，就已經將協商的「目標」鎖定為讓國府以某種形式公開宣稱放棄使用武力，而上面所引的公報內容正好可以解釋為國府「不使用武力反攻」，故他回美後也就此著力宣傳。顯然蔣介石與杜勒斯對公報的重點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姑且不論美國的宣傳，國內外媒體一看到公報就已經有自己的解讀。其實仔細檢視會發現，公報中文本的「主要不是憑藉武力」的用詞，與之前國府一再宣示的反攻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差異並不大，但英文譯本中的“not the use of force”卻給讀者很大的解釋空間。無論有意或無意，媒體幾乎全部忽略前面的“the principal means”，直接認定國府宣稱的是反攻「不是使用武力」，衍伸來說即是國府「放棄使用武力反攻」，甚至「放棄反攻」。¹²⁷例如：《紐

¹²³ 中文原文見《中央日報》，1958年10月24日，第1版。英文可見 Statement by Secretary Dull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9:1011 (November 10 1958), pp. 721-722。

¹²⁴ 見〈蔣介石日記〉，1958年10月23日，胡佛檔案館藏。

¹²⁵ 《宣傳週報》，卷12期18（1958年10月31日），頁1。通報發出的時間為10月23日。

¹²⁶ 蔣介石杜勒斯談話紀錄，1958年10月23日，407.1北美司，總統談話資料（三），外交部檔案。

¹²⁷ 負責翻譯的葉公超向蔣介石解釋他的譯文無誤，但蔣認為讀者不會注意上文的「主要與不主要」（事實上蔣自己也沒注意到），這就與他原先使用的「憑藉」「原意完全不同」。見上星期反

約時報》10月24日第一版的標題是「蔣答應不用武力贏回大陸」，報導內則開宗明義指出：杜勒斯與蔣介石「宣稱」國府不會使用武力回到中國大陸。¹²⁸其他美國與西方的報紙，也紛紛以蔣決定「放棄對大陸使用武力」為標題。東京的《每日新聞》甚至說國府在「放棄使用武力」解放大陸後，等於自己承認台灣的地位是一個「地方性政權」，並稱此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以來最大之政策改變」，對中國問題與國際政治均有極大影響。¹²⁹

對國府本來就有批判性的讀者，更是認定國府在公報中宣稱放棄使用武力反攻。例如雷震、王世杰等認為公報等於聲明國府放棄使用武力反攻，加上「三民主義」只是為了遮羞；雷震甚至認為：國府「過去瞎吹反攻大陸過甚」，發表這樣的公報讓人民「失去信仰」，應該要有反對黨上台。¹³⁰香港《工商日報》指出公報顯示國府放棄武力反攻、接受兩個中國，讓華僑人心猶如「吃了顆政治原子彈」；《星島日報》說國府放棄反攻等於自殺；《成報》則說杜勒斯花了三年也無法讓中共放棄在台海使用武力，卻花了三天就讓蔣介石聲明不用武力反攻；《新生晚報》甚至說中共未打敗國府，杜勒斯卻顯然戰勝了蔣介石！¹³¹至於在美國更是「僑社譁然，咸表失望」。¹³²換句話說，美國刻意的宣傳與媒體對公報的解讀，造成舉世認為國府「放棄以武力反攻」、甚至「放棄反攻」的印象，讓國府自認的外交成功變成宣傳挫敗，甚至連基本國策都受到挑戰。

公報發布兩天後，中共發布了新的「停火」聲明，給國府丟下兩顆額外的「紙彈」：單日砲擊與直接談判。中共宣稱此後「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讓金門可以順利補給。接著指出美國策略是要

省錄，〈蔣介石日記〉，1958年10月25日，胡佛檔案館藏。

¹²⁸ *The New York Times*, 1958.10.24, p. 1.

¹²⁹ 見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6（2001年12月），頁279-280的討論。

¹³⁰ 中美聯合公報反應，1958年10月24日，412北美司，中美聯合公報，外交部檔案；雷震，《雷震日記》，1958年10月23日至1958年10月25日，收入《雷震全集》，卷39，頁388-389。

¹³¹ 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各國輿論反響簡報，1958年10月27日，713.1情報司，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外交部檔案。

¹³² 鄭彥棻函黃少谷，1958年10月28日，707.5情報司，金馬局勢對外宣傳，外交部檔案。

孤立台灣，接著託管台灣，製造兩個中國；會談中國府吃了點虧，但公報「沒有法律效力，要擺脫是容易的」，要國府不要繼續「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後走到存身無地」；也再度呼籲「中國人的事只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難於解決，可以從長商議」。¹³³國府並不認為軍事衝突將就此終止，但中共的聲明顯示「第二回合」的台海鬥爭是更險惡的政治戰，因各方紙彈攻擊的不僅是外島的價值，更嚴重的是質疑國府完成其「神聖使命」的意願。爲了因應這樣的局面，國府在砲戰後密集檢討，加強了內、外的宣傳機制，也重新思考並釐訂了宣傳的方針與策略，因而在既有的反攻宣傳中加入了新的元素。

三、砲戰後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

其實台灣內部一開始對公報的批評聲浪並不太高，但在美國大力宣傳國府放棄使用武力，以及海外華人絕大部份批判國府不該放棄武力反攻之後，國內媒體的批評聲音也逐漸增強。爲了維持海內外民心，國府密集討論新的宣傳策略，並加強宣傳工作，逐漸確立了將公報內涵、「人民公社」宣傳與「反攻大陸」的概念結合，成爲新的反攻論述。

（一）「正視現實、變法革新！」¹³⁴

國內媒體（黨營報除外）對公報的最初反應，多半是稱許國府所珍視的中美團結保金馬；至於「放棄使用武力」一點，頂多只是溫和地指出不必放棄「主動與適時」的使用反共武力支持大陸抗暴。¹³⁵而面對國外媒體的「誤解」，外長黃少谷、駐美大使葉公超，以及行政院長陳誠紛紛公開解釋：國府絕未「放棄使用武力」。他們指出只要中共發動攻擊，國府一定使用武力反擊，甚至打

¹³³ 〈國防部彭德懷部長再告台灣同胞〉，《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6日，第1版。

¹³⁴ 取自〈正視現實·變法革新——「不使用武力」以後的應有作法〉，《聯合報》社論，1958年10月30日，第2版。

¹³⁵ 見1958年10月24日《聯合報》、《徵信新聞》與《公論報》的報導。

到大陸去；大陸爆發類似匈牙利抗暴的反共革命時，也必定使用武力支援。葉公超就直接了當地跟記者說：「沒有一個國家既保有軍隊，而又放棄使用武力的。」他們也強調公報此點真正的意涵，是9月底以來就不斷強調的「反攻的基地在大陸人心」，也就是「政治基礎」在光復大陸工作中的重要性。¹³⁶《中央日報》則打出總理牌，指出國父說過「革命戰爭」與一般戰爭性質不同，戰勝不需完全憑藉武力；也列舉辛亥革命及北伐抗日的歷史經驗，證明勝利都是「決之於人心的向背」。¹³⁷

但這些解釋顯然說服力不夠，約一週之後國內對公報的批判聲浪逐漸浮現。對於可以使用武力支援抗暴的說法，《聯合報》社論直率指出：「誰能說我們先行發動反攻，再由大陸抗暴人民來響應，與等待大陸革命爆發以後，我們再來支援，這二者之間會沒有甚大的距離？」¹³⁸《自由中國》認為：這種說法等於證實國府只保留響應大陸革命使用武力之權，似乎把光復大陸主要責任「推到大陸人民身上」，將「國家的命運託於不可知之數」。¹³⁹《公論報》社論也認為：若無外力推動，大陸大規模革命難以形成；若外援無望會使同胞灰心，僑胞也會因失望而轉向。¹⁴⁰至於整體會談的結果，更被認為是嚴重的外交失敗。《自由中國》覺得國府應該可以避免「白紙寫黑字的承諾放棄主動使用武力的權利」，就算有祕密諒解也不用曝光，或者爭取以中共先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為條件；而國府在沒有要求「像樣的報酬」就自行放棄使用武力的外交武器，犯了原則、外交技術與認識上的錯誤，是「一項歷史性的大錯」，其結果也不啻公開承認兩岸為「分裂國土」。¹⁴¹《公論報》同意此點，認為公報等於承認有自由與不自由的「兩個中國」，降低了自己的國際地位。¹⁴²換句話說，

¹³⁶ 三人的補充解釋可見《聯合報》，1958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的相關報導。

¹³⁷ 《中央日報》社論，1958年10月30日，第2版。

¹³⁸ 《聯合報》社論，1958年10月30日，第2版。

¹³⁹ 〈論放棄主動使用武力之承諾〉，《自由中國》社論，卷19期9（1958年11月1日），頁5-6。

¹⁴⁰ 《公論報》社論，1958年11月1、2日，第2版。

¹⁴¹ 見前引〈論放棄主動使用武力之承諾〉，以及施治華，〈分析中美會談結果及「不使用武力」聲明〉，《自由中國》，卷19期9（1958年11月1日），頁5-6、10-11。

¹⁴² 〈「非憑藉武力」的解釋問題〉及〈光復大陸應不受任何限制〉，《公論報》社論，1958年

國內媒體大多認定國府在公報中聲稱放棄武力反攻，無異於接受「兩個中國」，是很大的外交失敗。

批評之外，國內媒體也提出補救之道，即是他們一貫呼籲的積極改革政治，藉此加強「政治反攻」能力。媒體同意反攻的憑藉應該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也表示可以理解國府「迫於需要」發表公報，以安撫美國被捲入反攻導致大戰的恐懼。¹⁴³其中最激烈的《民主潮》認為：國府辯解無法釋憂，唯有改進政風、實行憲法、對大陸強調「民主憲政」的號召，才可團結人心、光復大陸。其專文更尖銳地指出：國府在台實行的是排斥他黨的「黨族主義」、選舉、集會、結社、出版均不自由的「黨權主義」，歧視黨外企業的「黨生主義」；國府得徹底改變這「三權主義」，實行「基於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三民主義」，才是光復大陸正確的途徑。¹⁴⁴較溫和的《聯合報》社論，也指出國府「止謗莫如自修」，應該從「就建立除弊先於興利的政風馬上下手」。若是「既不承認放棄武力，又不從事政治努力」，會人心盡失、全盤皆輸。而政治努力上還要包括不要苛擾、蒙蔽人民，尤其「不要阻止人民批評政府」。¹⁴⁵簡而言之，非黨營媒體藉著公報發表後的批判聲浪，接續了 1956 年以來改革的呼籲，要求國府以政治革新、實施民主憲政、包容輿論批評等，來實踐公報所揭櫫的「政治反攻」。

除了要求國府加緊政治改革外，國內媒體還指出以往「反攻在即」宣傳的「失策」。《自由中國》指出國際人士要求金馬撤軍、中立或交給中共，都是因為「這些年來政府毫無事實根據天天高叫反攻，使國際人士把我們看作危險份子，把駐金馬重兵看成可能惹是生非的戰爭導火線。」國府明知時機未成熟、條件未具備，早該注意國際反應，少事叫囂，就不會屈辱到「要自己親口來取

11 月 1、2 日，第 1 版。

¹⁴³ 《自由中國》社論，卷 19 期 9（1958 年 11 月 1 日），頁 5-6；《公論報》社論，1958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¹⁴⁴ 〈我們對中美聯合公報的感想〉，《民主潮》社論，卷 18 期 21（1958 年 11 月 1 日），頁 2-3；朱文伯，〈光復大陸的途徑〉，《民主潮》，卷 18 期 21（1958 年 11 月 1 日），頁 8-9。

¹⁴⁵ 《聯合報》社論，1958 年 11 月 2 日、1958 年 11 月 8 日、1958 年 11 月 13 日，第 2 版。

消自己的立場」。¹⁴⁶《公論報》則說：政府不只一次向僑胞說反攻有決心、準備已成熟，只要時機一到或敵人來犯，我即揮軍登陸，公報會讓僑胞失望而轉向，故建議國府要坦誠解釋公報聲明的原因，及今後政治反攻的長遠計畫，千萬不要像過去「掩飾誇大」，反而自毀信譽。¹⁴⁷《聯合報》社論也指出：國府過去在時機未熟時「過於強調反攻」，目前時機更成熟時「卻作了相反的宣布，那真是非常不幸之事」。¹⁴⁸簡言之，除了政治改革外，國府對「反攻大陸」也得有新的說法。就在此時，中共正全面推行的「人民公社」運動，卻意外成為國府「反攻大陸」宣傳的新工具。

（二）「消滅『奴役人民、毀滅文化』的人民公社！」¹⁴⁹

如前所言，國府簽訂公報時認為「非憑藉武力」一點，與之前一再重述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以及9月底以來所強調的「反攻的基地在大陸的人心」是一致的，但媒體解讀卻完全走調。就算不理會國際輿論，國內與僑界對公報的批評或質疑，也挑戰了國府「存在的理由」，嚴重影響台灣軍民的士氣與反共決心，這是嶄新的宣傳局面，需要更積極、更全面地因應。國民黨在11月間召開了六次中常會，討論都聚焦在宣傳問題。當時除公報外，中共正積極推行的人民公社也是重大的宣傳議題。此外，中共隔日砲擊與和談攻勢也必須反擊，但比起「放棄武力反攻」來說，這兩者的殺傷力相對較小，只需指出中共詭謀必定失敗、國府也完全不理會中共的誘和即可因應，¹⁵⁰最大的難題還是在公報宣傳。在國民黨中央討論宣傳對策的過程中，公報與公社宣傳逐漸結合，「人民公社」也意外成為中共當時送給國府最好的「反攻宣傳」禮物。

1958年3、4月間，中共在遼寧、河南開始試辦「人民公社」，7月間逐

¹⁴⁶ 《自由中國》社論，卷19期9（1958年11月1日），頁5-6。

¹⁴⁷ 《公論報》社論，1958年11月1日，第1版。

¹⁴⁸ 《聯合報》社論，1958年11月5日，第2版。

¹⁴⁹ 〈針對共匪推行人民公社暴政宣傳標語〉，《宣傳週報》，卷12期24（1958年12月12日），頁18。

¹⁵⁰ 見《宣傳週報》，卷12期19（1958年11月7日），頁4；《聯合報》，1958年11月18日，第1版。

漸推行到各省，在 10 月初造成公社化的高潮，並與「全民皆兵」運動結合。國府的公社宣傳原來只是對大陸心戰的一部份，從 8 月中共正式宣布實施人民公社之後就已經開始。到 10 月下旬，《中央日報》已經連續報導中共推行公社遭到農民積極反抗的消息，還引用《時代雜誌》(*Time*)的評論，認為公社不會成功。¹⁵¹最初公社宣傳的主要對象是大陸，希望擴大人民的不滿、激起抗暴，以配合國府的軍事反攻；對國內與僑胞的宣傳，則希望讓人民增加對中共反感，以激起「積極參加反共抗俄大業」的熱情，此與砲戰之前的反攻抗暴宣傳一脈相承。¹⁵²

11 月初，面對有關「放棄反攻」的質疑，國府認知到需要重新思考「光復大陸」的計畫與宣傳。這時大陸上公社與全民皆兵推行得如火如荼，國府認為這將使大陸的社會組織與人民生活發生根本的變化，因此與「光復大陸整個政策密切相關」。雖然公社將增加中共的控制力，但也有重大缺點，例如管理不易、與人民矛盾尖銳化、人民有機會可直接武裝反抗等；加上有知識分子參加，只要有計劃組織即可變成反抗基地。國府因而體會到宣傳可以轉個彎：從重覆解釋台海戰爭的性質，改為讓世界了解公社問題與人民反抗真相，以轉變國際上對反攻的負面想法。¹⁵³原先強調公社是中共加強控制人民的集中營，準備隨時把人民當蘇俄侵略的砲灰，以此鼓勵大陸同胞消極怠工或積極破壞公社。陳誠認為應以公社的奴役制度與《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理想社會相對照，「作為對大陸心戰宣傳之長期主題」。蔣介石則加上公報所揭示的「文化」元素，指示以公社造成「家破人亡、斷子絕孫」，國府則保證恢復家庭自由以及復興保存文化作為宣傳口號與重點。¹⁵⁴

至於公報，其實其內容除了「非憑藉武力」一點外，在國府保外島、保中美合作與保正統上都作了對國府有利的宣示。公報說「雙方僉認在當前情況之

¹⁵¹ 《中央日報》，1958 年 10 月 17 日、1958 年 10 月 20 日、1958 年 10 月 25 日，第 2 版。

¹⁵² 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95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11 月 5 日，黨史館藏。

¹⁵³ 附件一：共匪「人民公社運動」與「全民皆兵」之分析，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95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11 月 5 日，黨史館藏。

¹⁵⁴ 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98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11 月 19 日，黨史館藏。

下，金門、馬祖與台灣、澎湖在防衛上有密切之關連」，且中共行動「促使中美間之合作更臻密切」；並言「美國政府及其人民對於中國人民具有莫大信心，對於中國人民為尊重人性尊嚴與家庭生活之文化所已提供並將繼續提供之偉大貢獻，深表敬佩。美國確認中華民國為自由的中國之真正代表，並為億萬中國人民之希望與意願之真正代表。」亦即美方承認國府代表了「中國文化」與「人民意願」，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元素，卻被淹沒在「放棄反攻」的批判聲中。國府因此認為宣傳在原則上「不必就公報多所辯論」，只要強調中共砲擊失敗、軍事上進退維谷，和談與間歇砲擊都顯示其困境。另一方面，則要加強黨內教育、增進黨員對公報的了解，使其能「積極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以準備反共復國。對自由地區與海外則坦白釋疑、闡釋公報的積極面，並「暗示」放棄使用武力的說法是為了配合外交與對外宣傳。國際上當然要繼續強調共黨陰謀與金馬為全球反共防線一環；對大陸則以中共砲戰失敗、內部危機加重，來號召大陸同胞破壞公社、起而革命。總之，要透過各種管道的宣傳，沖淡公報的負面效果，擴大其正面意涵，希望可以團結海內外力量向激起「大陸革命的目標前進」。¹⁵⁵

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公報與公社的宣傳，從原本分別針對「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逐漸融合，以公報內的文化元素，來證明國府才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並以公社破壞中國文化、民族精神、倫理觀念與生活方式等來加強此代表性；此外，也以公社暴政來證明抗暴與反攻的可能性。¹⁵⁶新論述的邏輯是人民公社勢將引起大陸人民的反抗，而「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生活方式與保存文化傳統的對比將激化此種反抗，只要有外力支援即可誘發大規模的反共革命、導致部隊倒戈，國軍再趁機反攻，中共必定覆亡。

¹⁵⁵ 附件二：「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在宣傳心戰方面應有之措施要點草案」，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94次會議紀錄，1958年11月3日，黨史館藏。此草案修改定稿登在《宣傳週報》，卷12期21（1958年11月21日），頁6。

¹⁵⁶ 《宣傳週報》，卷12期20（1958年11月14日），頁5及《宣傳週報》，卷12期21（1958年11月21日），頁2。

(三) 「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¹⁵⁷

國府有關公社宣傳在 12 月間如火如荼的展開，尤其是傳出毛澤東不再擔任中共國家主席之後，國府更是積極宣傳要「把握共匪內部危機、支援大陸反共革命」，對於公社「吾人不可坐待其失敗，亦不應坐視其成功，而必須把握共匪內部的危機，支持大陸反共革命，深信人民公社的失敗亦則為共匪政權的崩潰。」換句話說，公社的失敗可以導致「光復大陸」。¹⁵⁸對部隊宣傳除了總政戰部外，國防部還重組心戰督導小組，並與美方合組「中美聯合心戰研究指導小組」，以加強對部隊與大陸的宣傳心戰工作。¹⁵⁹

除了黨宣傳體系與心戰體系外，國府還透過《中央日報》及民營報的言論，以及國府大員在國內外各種場合的演說，向國內外宣達、形塑新的反攻論述。《中央日報》以社論逐步點出新論述的重要元素：首先是強化反攻主要憑藉為「三民主義」的論點，提出孫中山早在 1924 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就已經訓示了「主義勝過武力」，砲戰之後的政治戰，就是以「三民主義」為對付共產主義的主要力量。並指出「戰爭勝負不完全依賴武力決戰，主要關鍵為雙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思想上的大決賽」，故要時時在戰爭中求進步。¹⁶⁰其次則強調公社暴政造成大陸革命的必然性，指出中共推行人民公社是為了對台武裝侵略而加強內部控制，可見共匪對「反共革命的恐怖」。大陸人民在公社摧殘下，過的無疑是地獄生涯，這將造成中共政權的危機，「在可見的將來，一個無可估計的大革命運動，隨時有可能在大陸任何地區，作驚天動地的爆發」，由此也會造成「我們反攻復國的新形勢」。12 月間傳出毛澤東將「下台」，不再擔任人民政府主席，更是坐實了這樣的判斷。¹⁶¹

媒體之外，國府也透過高層演講的方式，安撫海內外因公報而不安的情

¹⁵⁷ 《聯合報》，1958 年 12 月 24 日，第 1 版。

¹⁵⁸ 有關公社宣傳的資訊，可見 12 月份各期《宣傳週報》內的相關報導。

¹⁵⁹ 國防部參謀總長手令謄錄本，1958 年 11 月 5 日，〈王叔銘個人資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¹⁶⁰ 《中央日報》社論，1958 年 11 月 12 日、1958 年 11 月 15 日，第 2 版。

¹⁶¹ 見 1958 年 11 月 12、13、19 日，與 1958 年 12 月 2、16 日等各日的《中央日報》社論。

緒。國內疑慮的消弭，主要是透過陳誠在 11 月 12 日中樞紀念國父誕辰典禮上演講，他的講詞包含了公報與公社宣傳的所有元素。他強調革命目標是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在台一切措施都是根據「三民主義」。他還列舉了蔣介石的革命理想與《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重點，說：「我們要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其基礎還是在家庭倫理。」公社拆散家庭，總統則指示「國之本在家」，並列舉台灣與大陸各方面的高下對比。但陳誠也指出中共永不會放棄武力，國府要恢復大陸人民的自由必須繼續加強武力。最後，陳誠引國父說「吾人對於國民所負之責任，非圖謀民生幸福乎？」不過「世事萬變，惟堅忍乃成功。」而總統也強調「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希望國人對革命與反共鬥爭要有耐心。¹⁶²演講之外，陳誠也在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強調公社已激起人民反抗，相信會有更大規模的反共革命，而國府一定使用武力支持。¹⁶³

對美國民間與僑社宣傳，則由當時在美國訪問的蔣夫人以及駐美大使葉公超擔負主要責任，他們分別對記者與各種邀講團體闡釋國府的立場，焦點當然是公社暴政與大陸反共革命的必然性，以及國府決不放棄恢復大陸人民自由的使命。蔣夫人在 11 到 12 月間，連續在邁阿密、印第安那波里斯、新港、紐約、波士頓等地的各種集會中發表演說，並接受廣播與電視記者訪問，談話的重點在公社暴行以及大陸發動反共革命的「必然性」。她指出：中共在大陸組織公社，讓人民沒有私有財產與私人生活，而「人類的忍耐性只能忍受這麼多，超過此限度，就會不顧一切，所以，整個大陸上已經發生了反抗行動。」國府的使命是「使中國人民從共黨壓迫之下獲得自由」，只要「共匪統治下的人民的情緒決定了時間後，中華民國的部隊就將返回大陸。」¹⁶⁴

蔣夫人以美國各種社團為主要宣傳對象，葉公超則美國社團與僑社兼顧，

¹⁶² 《聯合報》，1958 年 11 月 13 日，第 2 版。

¹⁶³ 見《聯合報》，1958 年 10 月 31 日、1958 年 11 月 3 日、1958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¹⁶⁴ 蔣夫人的演講與行程，可見 1958 年 11 月 9、10、15、16、17、21、26 日，與 12 月 10、11 日《聯合報》的報導。

強調國府將加強文化建設，以與中共刻意毀棄文化作對照，並說明國府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葉公超在協助發表公報後返美，立即召集駐美各領館首長開會，討論如何因應當前不利的宣傳局勢。除揭發公社暴政、大陸人民慘狀與中共窮兵黷武的實情，以爭取世界輿論支持外，他認為要回應僑報僑胞的失望與批判，以及美國輿論認定的國府放棄反攻，必須積極推展文化宣傳，使美人民「確信吾人在台保存中國文化，並在繼續發揚」。也以此證明國府繼承中國法統，光復大陸為其神聖使命，也將積極促進大陸抗暴，必要時使用武力。¹⁶⁵葉公超在 11-12 月間在全美展開宣傳之旅，對各地僑社與美國社團發表演說。¹⁶⁶對僑社，葉公超強調公報目的在讓國際明瞭「我非窮兵黷武國家」，並保證國府未放棄以武力收復大陸。在說明公社暴政時，葉公超指出：「中共是反中國文化的，他們所接受的思想完全異乎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傳統，及中國人民的習俗。」¹⁶⁷對美國聽眾，葉公超則強調公社是共匪「旨在澈底消滅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計畫」的一部份。他說，公社制度是「一種大規模的動員，以實現一種反文化和反人道的思想」，企圖毀滅家庭制度，建立嚴密控制。對照台灣的進步顯示更好更高的生活水準，能夠在「不放棄我們文化傳統基本特質」的情況下達成。並說國府正在尋求一個更有活力的文化計畫，「以便我們能以保留我們傳統文化的優點，而同時也能達到必要的社會及經濟進步，藉以向大陸同胞樹立一個榜樣，傳統與進步可以相行不悖。」¹⁶⁸簡言之，葉公超特別著重宣傳國府「保護中國文化」的政策，以與中共的反文化相對照。

美國之外，外交部長黃少谷也藉著到義大利參加教宗登基與參加墨西哥總統就職儀式的機會，向西歐南美僑胞與各國首長解釋國府砲戰以來對外島與反攻的立場。¹⁶⁹對盟邦首長，黃少谷的談話以緩和國際上擔心國府挑起大戰的疑

¹⁶⁵ 駐美各領館首長會議紀錄，1958 年 11 月 1 日，707.5 情報司，對美宣傳（一），外交部檔案。

¹⁶⁶ 見 1958 年 11 月 8、10、11、12、13、27 日，12 月 8、10、12、13、19 日《聯合報》的相關報導。

¹⁶⁷ 《聯合報》，1958 年 11 月 10 日，第 1 版。

¹⁶⁸ 《聯合報》，1958 年 12 月 10 日，第 1 版。

¹⁶⁹ 黃少谷於 11 月 1 日到 12 月 10 日間，正式訪問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葡萄牙、日

懼為主。他強調國府在金門駐軍只有中共當面部隊的五分之一，砲擊前並未挑釁，是中共主動攻擊；國府一方面為世界抵抗侵略，一方面要竭力維持和平，故在砲擊期間竭力自制；金門不但維繫大陸人民的信心與希望，對自由世界的價值也猶如西柏林。至於「光復大陸」，方式甚多，最可能為「大陸人民不能再忍受虐政，群起抗暴，我國軍自必登陸予以支助，如此則消滅共產政權決非難事。」但很難預料何時會發動大規模革命，「吾人必須耐心等待時機」。除了以政績爭取人心外，國府也竭力與大陸反共力量連絡以配合行動。¹⁷⁰黃少谷向僑界也做類似的解釋，尤其強調國府將堅決保衛金馬，而台灣的進步則為大陸重新建國的模範，並闡明公報中不憑藉武力反攻說法的用意。¹⁷¹

公社與公報融合的「反攻大陸」宣傳，到年底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第五次全體代表大會的各種相關宣示中完整呈現，在蔣介石次年的元旦文告中成形。12月23至24日召開的光復會代表大會中，¹⁷²除了軍事、外交、匪情等報告以及主任委員陳誠的訓詞內充滿公社與反攻結合的訊息外，公報發表後未曾公開談話的蔣介石也出面訓示宣導。蔣在訓詞中指出：光復大陸「第一就是光復大陸的人民，第二是光復大陸的土地」；若人民精神物質生活不能恢復與重建，只光復土地沒有用；抗戰也光復過失土，不到三年大陸就淪陷，就是因為不能豐足人民的精神與物質生活條件。他說《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所揭示的，是使每個人民都能獲致自由康樂生活所必須；而〈禮運大同篇〉則是社會生活最完美的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理想與實踐。相對之下，中共積極推行的人民公社則「毀滅了我們的倫理，毀滅了我們的道德，更毀滅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並毀滅了一切文化——那不但是毀滅了中國文化，而且是要毀滅整個的世界文

本等，與西元首佛朗歌、外長卡斯底埃拉；法總理戴高樂、外長柯佛特墨維勒；比王寶杜安、首相艾思根、外長魏尼；葡外長；日首相岸信介、外相藤山等談話。

¹⁷⁰ 黃少谷與各國首長的談話紀錄，見黃少谷致蔣介石、陳誠簽呈及附件，1958年12月20日，407.1北美司，黃部長談話紀錄及函件，外交部檔案。

¹⁷¹ 黃少谷公開談話內容，可見《聯合報》，1958年11月17-18日、1958年12月3日、1958年12月11日，第1版的報導。

¹⁷² 當年大會的主要工作是針對「人民公社」實施後的情勢，檢討之前完成的方案並加以補充修訂。

明」，故在大陸內部各種有形無形的鬥爭已經普遍發展。他接著強調：光復大陸是要以三民主義為主要的途徑，不是僅僅憑藉武力收復失土，因為從民國15年(1926)以來就是以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的主要途徑，反攻也是「以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亦即以主義為主，武力為從」。最後，他指示光復大陸的一切設計，均須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才能光復人民；只要能光復大陸人心，光復大陸土地是隨時可做到的。¹⁷³

一週後，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進一步闡釋這個反攻論述。他先指出公社造成史上空前的奴役制度，中共砲擊後馬上實施公社運動，就是要將大陸造成奴工集中營以支持其長期侵略，故侵台戰爭與公社密切相關。國軍已經鞏固台海勝利基礎，大陸同胞則可以積極反抗或消極怠工來破壞公社，如此抗暴有增無已，匪軍也將倒戈，兩面夾擊才能提早達到反攻復國的勝利。故反攻戰略始終是「以政治為主，以軍事為從，以主義為前鋒，以武力為後盾，以大陸為本戰場，以臺灣為支戰場。」他要全國同胞抱定主義戰勝一切、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在台澎金馬全力推行三民主義，以臺灣為模範省，作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藍圖。¹⁷⁴至此，「公社反傳統文化必將引發抗暴，國府以支援抗暴藉機反攻」的反攻宣傳主軸，以及「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的宣傳口號完全成形。

結 論

最後，再回到前言所提歐斯本的觀察，以及本文所想探索的問題：國民黨（國府）是否改變反攻大陸的立場？是否因此調整了國民黨的理論基礎？還是只改變了說法？是否有決定性的影響？其實歐斯本所言的改變國府反攻立場，正是杜勒斯訪台的目標，故他回美後向記者強調公報中「這個全新的公開

¹⁷³ 見《中央日報》，1958年12月24日，頭版頭條。

¹⁷⁴ 蔣中正，〈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1959年1月1日，《總集》，卷33，頁215-221。

陳述非常重要，我認為將會帶來重點的轉移，將他們的任務置於長期的基礎上，將來會充滿重大的意義。……這牽涉到的是重大的重新調整，將其使命定位為和平的而非好武的。」¹⁷⁵換句話說，杜勒斯認為公報的說法是「全新的」，反攻將成為「長期的」，而國府政策的調整則是「重大的」。

台灣內部觀察者也認為國府對「反攻大陸」的說法確實是「新」的。公報發表後，蔣廷黻就對胡適說：不能依賴武力反攻「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也是一個新轉變的起點」，胡適同意這樣的看法；《民主潮》則指出國府改變可以主動、剋期反攻的論調，「對中國人民算是一種新穎的啓示」。¹⁷⁶連國民黨中央都認為「今後反共復國工作已進入新階段」。¹⁷⁷而 1959 年元旦當天，《聯合報》社論則指出「從『反攻大陸』口號的高喊到強調實現三民主義為光復大陸的主要途徑，是十年來的一大轉變。」¹⁷⁸換句話說，從國民黨內部到當時黨外觀察者也都認為國府的反攻國策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

本文焦點不在反攻國策本身，只討論「說法」的部份。砲戰期間「紙彈」的攻擊，確實為反攻大陸宣傳注入了一些「新」的說法與概念。首先，「金馬是反攻跳板」被「反攻的基地在大陸人心」取代，「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則改為「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的「新」口號，並在往後幾年成為宣傳反攻的準則。例如 1960 年 4 月的一份宣傳要點指出：應以三民主義感召海外與大陸各地區人民，與共匪直接間接鬥爭，而「以『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之政略思想，從事反攻復國的革命戰爭，必能收得事半功倍的效果。」¹⁷⁹以下數年間，強調的是「光復大陸」，而非「反攻大陸」這個軍事意味較濃厚的口號。¹⁸⁰

¹⁷⁵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October 2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9:1012 (November 17, 1958), p. 770.

¹⁷⁶ 胡適，〈關於言論自由和反共救國會談〉，《自由中國》，卷 20 期 1（1959 年 1 月 1 日），頁 9-11；〈我們對中美聯合公報的感想〉，《民主潮》社論，卷 18 期 21（1958 年 11 月 1 日），頁 2-3。

¹⁷⁷ 《宣傳週報》，卷 12 期 21（1958 年 11 月 21 日），頁 6。

¹⁷⁸ 《聯合報》社論，1959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

¹⁷⁹ 《宣傳週報》，卷 15 期 18（1960 年 4 月 29 日），頁 6。

¹⁸⁰ 雖然很多媒體或官員還是習慣性地會說「反攻」，但查《聯合報》的報導，1959-1961 年間內含「光復大陸」的文章報導篇數確實超過「反攻大陸」者，1962 年之後「反攻大陸」又佔上風。

亦即在砲戰後，反攻「宣傳」逐漸從「軍事第一」轉成強調政治反攻。

其次，反攻的時機或條件的說法也有所改變。砲戰前強調以反攻引發抗暴，之後轉為先激發抗暴再配合反攻；而反攻大陸也從「立即」或「隨時」的行動變成「長期」奮鬥的目標。如前所言，砲戰爆發前夕，國府一直強調中共開始攻擊，國府馬上反攻。但砲戰爆發後，國府就開始為反攻加上「長期」的概念，例如陳誠在 9 月 24 日向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說：「反共抗俄戰爭是長期性的」；蔣介石則在國慶文告中說：反共戰爭「必須以全面準備，作長期奮鬥」，主要策略則是「長期消耗共匪戰力」。公報發表後，蔣在光復節文告中重述此「長期」概念，指出光復大陸需要萬眾一心，「以全面的準備作長期的奮鬥」。國防部亦指示官兵今後應「具備少康中興的大志、勾踐復國的耐力」。¹⁸¹因此，國府在砲戰後的宣傳中，確實將「反攻大陸」的任務長期化了。

最後，公社配合公報的宣傳將國府「正統」的依據逐漸從道德基礎轉向文化基礎。砲戰後國府以中共公社暴政對文化傳統的摧殘，作為激發抗暴、促成反攻有利時機的主要宣傳工具，與之前強調「自由」與「奴役」的對比，有相當程度的轉變，也逐漸轉化了國府作為「中國人民」代表的依據：亦即「自由中國」從保障人民的「自由」，逐漸轉向保存中華民族的「文化」。¹⁸²到 1960 年代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國府乃順理成章地推行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自由中國」也逐漸轉變成「文化中國」。而「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的反攻口號，到 1980 年代演變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說法。換句話說，國府雖是因應情勢調整宣傳策略與內容，但砲戰對反攻大陸的宣傳、實際政策與自我定位，都產生了相當長遠的影響。

一位美國紀錄片導演 Kevin Rafferty 曾說過：「宣傳有兩種，一種是你知

¹⁸¹ 陳誠與蔣介石的說法，見《聯合報》當日的報導；《台海戰役國軍政工作紀要》，頁 459-461。

¹⁸² 其實蔣介石早在 1950 年就已經對黨員強調：反共戰爭的特質之一是保障歷史、倫理與道德的文化戰爭；其成敗得失非決定於軍事與政治，而是取決於社會與文化，因為中共的文化工作，「是要滅絕我們的歷史文化」。見蔣介石，〈為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總集》，卷 32，頁 227。只是在 1950 年代初期「軍事第一」的反攻氛圍中，文化戰爭的層面一直未被強調，到此時中共實施公社後才被加強宣傳。

道自己在說謊，另一種是你自認是在陳述事實。」¹⁸³雖然很多當時的觀察家與後來的批判者認為國府的反攻宣傳屬於前者，但從國府內部的文件，尤其是蔣介石的日記內容來判斷，國府的宣傳較接近後者，即陳述自己的「希望」與「計畫」。雖然這些計畫終究無法付諸實行，但卻非為了合理化其政權的統治與獨裁而虛構。¹⁸⁴國府建構了一個「反攻必勝、建國必成」的反攻論述，期望可以「說服」鐵幕內外的中國人支持其反攻大業，同時「說服」自由世界的國家支持或者至少不阻撓其反攻行動。但在冷戰逐漸趨向兩大陣營「和平共存」，中共則因長久穩定控制大陸而逐漸獲得國際承認與接納的潮流中，國府的反攻國策與宣傳面對的是愈趨強化的逆勢，只能隨機因應。砲戰對反攻宣傳主軸的改變，顯示的是國府不得不然的調適——當然這些說法的調整對實際策略也發生了影響，但此為後話。

1959年春節過後，蔣介石巡視阿里山，看到祝山觀日峰附近建了載波台，那是他在1949年生日時立願反攻大陸成功後要建凱歌堂的地方，他因此對著祝山祈願，希望到他80歲時（他當時72歲）可以「復國完成，拆台建堂」。兩天後他到了玉山，再向主峰發願：祈求上帝讓他80歲時成功地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屆時他將在玉山主峰建立「鐵十字架紀功碑」，以感謝上帝的恩典。¹⁸⁵稍早，他還記下「軍事反攻，以解放黑暗奴役的地獄中無數同胞為目標。如對輾轉於痛苦輪下悲啼呻吟的手足，而不能攘臂救援，則人生還有何意義？政府存在，又有何意義？故恢復國土，不是今日主要目標，而乃以拯救同胞為我第一要務矣。」¹⁸⁶以蔣介石在日記中的記載作為本文的結語，只是想讓讀者知道：

¹⁸³ 引自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 178。

¹⁸⁴ 例如李敖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是騙人的口號，早就被《自由中國》所拆穿，《自由中國》卻反被迫害，見王丰，《反攻大陸 vs. 解放臺灣》（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95），頁13。林麗雲也認為「反攻聖戰」是國民黨政權正當性的基礎，見林麗雲，〈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傳播文化》，期8（2000），頁185。另見王景弘，《採訪歷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頁153；李筱鋒，〈久違的符號——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收入氏著，《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北：玉山社，2007），頁480。

¹⁸⁵ 見〈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15日、1959年2月17日，胡佛檔案館藏。

¹⁸⁶ 民國四十八年大事表（1959年1月19日記），〈蔣介石日記〉，胡佛檔案館藏。

在蔣介石的心目中與計畫裡，國府確實沒有因為八二三砲戰而改變反攻的立場。¹⁸⁷畢竟，無論是蔣個人或者是國府，都不可能輕易放棄自己「存在的理由」。

¹⁸⁷ 蔣介石在砲戰之後的日記顯示：他個人完全沒有因為砲戰而改變「反攻大陸」與「光復國土」的決心，反而加緊思考反攻策略，並指示加快軍事準備，見 1958 年 11-12 月與 1959 年的〈蔣介石日記〉，胡佛檔案館藏。蔣這些思考與準備發展成 1960 年代前半的「國光計畫室」的相關反攻計劃，見國防部史編局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冊 3，第三章〈攻勢作戰整備〉。另見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外交部檔案

- 019.2 亞太司，台灣海峽（一）
- 405.21 北美司，美匪華沙會談（五）。
- 407.1 北美司，黃部長談話紀錄及函件。
- 407.1 北美司，總統談話資料（三）。
- 411.1 北美司，中美關係參考資料。
- 412 北美司，中美聯合公報。
- 429 北美司，金馬事件（三）。
- 429 北美司，外島。
- 429 北美司，金馬事件（六）。
- 700.1 情報司，總統言論。
- 707.5 情報司，我對外宣傳（一）。
- 707.5 情報司，金馬局勢對外宣傳。
- 707.5 情報司，約雇萊特公司宣傳案。
- 707.5 情報司，對美宣傳（一）。
- 713.1 情報司，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 729.83 情報司，金馬戰局（一）、（二）。

〈王叔銘將軍日記〉，冊 19-2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王叔銘個人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立法院院會速記錄〉，《立法院公報》，卷 22 期 2，1958 年 9 月。

陳 誠，〈石叟言論集〉，《石叟叢書》，台北：國史館藏。

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第 88-98 次會議紀錄，1958.10.08-1958.11.19，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蔣介石日記：1958 年、1959 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United States

1.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September 30," 39:1008, October 20, 1958, pp. 597-604.
2. Statement by Secretary Dulles, 39:1011, November 10, 1958, pp. 721-722.
3.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October 28, 39:1012, November 17, 1958, p. 770.

NIE 43-2-57.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

3. Washington: Dept. of State, 1990.

793.00/11-1858, 793.00/9-3058,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 United States.

Quemoy-Matsu 1958, Hagerty Papers, box 9, Eisenhower Library.

二、專書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8、23、32、33、39。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 王 丰，《反攻大陸 vs. 解放臺灣》。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95。
- 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2。
- 王景弘，《採訪歷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 林麗雲，《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
- 空軍總司令部編，《王叔銘將軍言論集》。出版地不詳：空軍總司令部，1958。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9，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2002。
- 高郁雅，《挑戰與困境：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5。
- 國防部史軍務局編，《八二三台海戰役》。台北：國防部史軍務局，1998。
- 國防部史編局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冊 3。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 國防部總政治部編，《台海戰役國軍政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
- 崔京生，《新中國海戰檔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 張友驊，《郝柏村強權興衰：李郝鬥爭實錄·解析郝日記》。台北：新高地文化公司，1993。
- 雷 震，《雷震日記(1957-1958)》，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卷 39。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 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 蔣中正，《本黨又是面臨時代一次考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8。
- Aldrich, Richard J. and Gary D. Rawnsley et al.,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London; Portland: Frank Cass, 2000.
- Belmonte, Laura A.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c2008.
- Bogart, Leo. *Cool Words, Cold War: A New Look at USIA's Premises for Propagand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ull, Nicholas J.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Halle, Louis J. *The Cold War as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7.
- Heil, Alan L. *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3.
- Medhurst, Martin J., ed. *Eisenhower's War of Words: Rhetoric and Leadership*.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Osgood, Kenneth.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c2006.
- Parry-Giles, Shawn J. *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5*.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 Rawnsley, Gary D. *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 BBC and VO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6-6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 Rawnsley, Gary D., ed.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Rawnsley, Gary D. Rawnsley. *Taiwan's Informal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Rawnsley, Gary D. and Ming-Yeh T. Rawnsley. *Critical Security, Democratisation and Television in Taiwa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 2000.
- Schwoch, James. *Global TV: New Media and the Cold War, 1946-6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 Scott-Smith, Giles and Hans Krabbendam, e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0*. London, Portland: F. Cass, 2003.
- Shaw, Tony. *British Cinema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 Propaganda and Consensus*. London: Tauris, 2006.
-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三、期刊與專書文章

-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32，2009 年 11 月，頁 221-262。
- 李筱鋒，〈久違的符號——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收入氏著，《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北：玉山社，2007。
- 林果顯，〈兩次臺海危機的戰爭宣傳佈置(1954-1958)〉，收入呂紹理編，《冷戰與臺海危機》。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10。
- 林麗雲，〈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傳播文化》，期 8，2000，頁 177-211。
- 胡適，〈關於言論自由和反共救國會議〉，《自由中國》，卷 20 期 1，1959 年 1 月 1 日，頁 9-11。
-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6，2001 年 12 月，頁 231-297。
- Armstrong, Charles K.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 February 2003, pp. 71-99.
- Long, S. R. Joey.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55-1961.” *Diplomatic History* 32:5, November 2008, pp. 899-930.

Parry-Giles, Shawn J. “Propaganda, Effect, and the Cold War: Gauging the Status of America’s ‘War of 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1994, pp. 203-213.

Taylor, Jeremy E. “Taipei’s ‘Britisher’: W. G. Goddard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ist China in the Cold War Commonwealth.”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9:2, December 2007, pp. 126-146.

Tsang, Steve (曾銳生).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I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四、報紙與期刊

《人民日報》，1957-1958。

《中央日報》，1958。

《公論報》，1958。

《民主潮》，1958。

《自由中國》，1957-1959。

《宣傳週報》，1953、1958、1960。

《徵信新聞》，1958。

《聯合報》，1952、1957-1961。

The New York Times, 1957-1958.

The Times, 1958.

Time Magazine, 1958.

五、學位論文

何宜娟，〈國民黨政府與反共抗俄教育之研究——以國（初）中歷史教材為例(1949-2000)〉，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胡芳琪，〈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反共文藝論述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Lin, Lihy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ss-State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1945-1995.” D. Ph.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1997.

六、網路資料

章詒和，〈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上）、（下），「大紀元」網站，<http://epochtimes.com/b5/7/5/3/n1697716.htm>，2007年5月3日上網，2009年9月12日下載。

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Return to the Mainland” Propaganda

Chang Su-ya^{*}

Abstract

In the wake of 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David L. Osborn, U.S. Political Consular in Taipei, reported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the Kuomintang had modified its basic political doctrine of “return to the mainland,” which might impact local politics. Di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really change its policy or only its “pres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paganda aspects of the policy, concluding that there were indeed new elements after the crisis. First, although the Kuomintang did not change its ultimate goal, the principle means shifted from military to political ones. Second, the “sacred mission” was presented as a long-term, instead of an immediate, effort. Third, propaganda attacking the evils of communism was supplemented with notions of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thus did “free China” gradually make a cultural turn. These modifications were made through careful evaluation; none were hasty decisions nor compe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the “return to the mainland” policy remained a statement of real intention, not merely a claim to legitimacy, and military preparations were not abandoned.

Keywords: Taiwan Strait Crisis, Quemoy, return to the Mainland, political counterattack,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propaganda, renouncing the use of forc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